



文  
卫  
史  
料





# 我亲历的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

刘卫峰 \*

## 永定河 母亲河

永定河发源于内蒙古和山西，上游分南北两大支流。北支为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和县；南支为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两大支流在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

永定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 5 省市 27 个县市，从河北省怀来县幽州村南流入北京市，经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自大兴崔指挥营村东出市境域，全长 650 千米。市境域内主河道长 189 千米，流域面积 3168 平方千米，占全市面积的 18.9%，其中山区面积 2491 平方千米。河床最宽处为 3800 米。主要支流有妫水河、清水河、天堂河等。

---

\* 刘卫峰：房山区融媒体中心副高级记者，“北京房山”两微一端负责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由于持续干旱，永定河上游来水减少，加上沿河用水结构不合理，使得下游平原河道自 1996 年后完全断流，河床沙化，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永定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为北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永定河滋养着这座城市，同时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指出推进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作为三个文化带之一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具有多元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历史文化属性，在人文领域内，既有世界文化遗产，



也有国家级、市级与区级等各级文保单位 400 余处。在文化种类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既有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民间文化，也有以香山双清别墅与来青轩等为载体的红色文化。

具体说来，在自然资源方面，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包括：

灵山风景区。灵山，亦称东灵山，号称“北京的屋脊”。灵山奇峰峻峭、花卉无垠，集高原、草原风光于一体，享有“北京小西藏”的美誉。

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花山处于华北陆台中部的燕山沉降带上，素有“华北天然植物园”之称。2008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百花山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鹫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海淀区西北部，3A 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百望山森林公园。位于海淀区西北部，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2001 年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妙峰山风景名胜区。位于门头沟区，多灌木、花卉，尤以千亩玫瑰花著称。2005 年，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十渡风景区。位于房山区西南，是国家 4A 级景区和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具有中国北方唯一一处大规模喀斯特岩溶地貌。2006 年 9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这里为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方山森林公园距北京 70 公里，以山奇、林密、洞幽、寺古享誉京城。上方山森林公园内的景观不但有出名的“九洞十二峰”，还有以“兜率寺”为首的七十二禅院，是集林、洞、寺、山、石各类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区。生长着华北地区少见的原始次生林和几十株古树名木，历史上称“幽燕奥室”，享有“南有苏杭，北有上方”之誉。公园占地 5300 多亩，1984 年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人文资源方面，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主要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诞生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坐落在霞云岭乡境内堂上村，不仅保留着历史旧址，还建有展陈丰富的纪念馆和党旗广场。2001 年 6 月暨建党 80 周年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词曲创作地题词。2016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被评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2018年被确定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成为北京市红色教育的一个新亮点。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也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的发现地。1927年开始发掘，1929年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北京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是西周燕国初年都城所在地，也是北京城的发源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香山公园。位于海淀区买卖街40号。清乾隆十年（1745年），进行大规模营建，乾隆赐名“静宜园”。香山公园是国家4A级景区。

颐和园。位于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9号。明武宗时建有“好山园”行宫，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为筹备其母六十寿典，开始扩建，二十九年（1764年）竣工，称清漪园。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建，改称颐和园。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经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静明园。位于海淀区内，以玉泉山为主体，玉泉山是西山东麓支脉，历史上是“沙痕石隙”，随地皆泉。建于清康熙年间，



原称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改今称。

圆明园遗址。位于海淀区内，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因此也称圆明三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咸丰十年（1860 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为遗址公园。

西山八大处。位于石景山区，在西山余脉的翠微山、平坡山、卢师山之间建有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寺、龙泉庵、香界寺、宝珠洞、证果寺等 8 座古刹。其中，二处灵光寺有宝塔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四处大悲寺里供奉的十八罗汉雕像，相传为元代著名雕塑家刘元手制。八大处为国家 4A 级景区，北京市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双清别墅与来青轩等革命旧址。位于香山公园南麓。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到达北平后，毛泽东居住在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居住在来青轩。双清别墅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第一站，作为中共中央指挥中心见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

宛平县抗日战争遗址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宛平县在历史上曾是北京（顺天府）的附廓县。1928 年，北京改为北平后，宛平县改隶河北省，县治迁至卢沟桥东侧“拱极城”内。1937 年 7 月 7 日夜，在这里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宛平城内，是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

此外，还有云居寺、潭柘寺、戒台寺、碧云寺、卧佛寺、妙峰山惠济祠、九龙山金陵遗址以及景帝陵。云居寺以藏经



洞闻名于世，共藏有石刻佛教经籍 1122 部 3572 卷，石刻经版 14278 石。

景帝陵是明代宗朱祁钰的陵园，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作为北方山地民居典型的爨底下村也是不可以忽略的。爨底下村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依山而建，错落高低。2012 年 12 月 17 日，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 永定河补水工程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多次调研永定河治理，要求把永定河治理作为首都水生态环境建设的一号工程。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把永定河治理作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头戏，扎实抓好各项任务，让永定河早日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

2019 年以来，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积极协调永定河上下游北京市、河北省和山西省，通过引黄水与永定河本地径流统筹调度、官厅水库上下游联合调度，推进永定河生态修复。

2019 年、2020 年，在国家部委以及山西、河北的大力支持下，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配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及北京市水务局连续两年组织开展了永定河生态水量调度。

特别是在 2020 年春季，干涸 40 多年的永定河下游河道实



现通水，京津冀晋实现水路联通，通水河长 737 公里，实现了通水至大兴国际机场附近河道的第一阶段目标。

截至 2020 年 10 月 27 日，官厅水库累计向永定河生态补水约 5.36 亿立方米，官厅水库累计向下游永定河补水 5.32 亿立方米。永定河持续有水河道明显增加，河道生物显著增加，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21 年 4 月 20 日，位于永定河上游的山西省大同市册田水库开闸放水，源源不断的册田水向下游奔涌而去，流经山西、河北后汇入官厅水库进行调蓄。根据调水安排，册田水库输水预计持续到 6 月 25 日，计划完成本地输水 1500 万立方米，下泄引黄水 0.84 至 0.96 亿立方米，预计入官厅水库 0.64 至 0.78 亿立方米，将为实现全线通水目标提供有利条件。

通过开展多次生态补水，河流生态功能进一步恢复，水生态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不断释放流域治理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应，永定河生态廊道重获新生。

永定河生态补水后，永定河现彩色河道，美景醉人。

### 拍摄到黑鹳栖息

近年来，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区园林绿化局、区水务局等各个职能单位不懈努力，为房山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动力。为更好地开展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房山区不断加强与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准确把握全区生物多样性热



点区域和野生动物动态变化数据，进一步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重点地区资源调查，准确掌握重点地区野生动物种群栖息群落分布情况，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我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经常在永定河流域进行拍摄。从官厅水库下泄口，沿幽州大峡谷顺河道而下，随处可见绿水绕彩树、彩叶在水中的美景，古村名刹点缀山间，呈现了北京母亲河最美的生态景观。

补水后，永定河流域房山段湿地生态环境质量快速提升，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2020年10月25日，我和王红永等几名摄影师一起在永定河房山段拍到了黑鹳起飞盘旋的场景。黑鹳是一种体态优美、体色鲜明、活动敏捷、性情机警的大型涉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种。在此之前，黑鹳很少光顾北京，而在北京也只有3—5只在房



山拒马河流域徘徊，此次我们拍摄到的黑鹳，是这种珍稀鸟类首次在永定河流域被发现。这也成为当时的一件特大新闻，《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学习强国》《千龙网》《人民网》《网易新闻》《腾讯网》等几十家媒体作了报道。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对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鹳的珍贵镜头所见证的生态变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朝闻天下》等栏目对此进行了重点报道。



“黑鹳的大批量回归，是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的一种证明。”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理专注保护北京地区的黑鹳已有 20 年，他解释说：“黑鹳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泥鳅等小型鱼类为食，通常觅食在干扰较少的河渠、溪流等地，通过眼睛搜寻食物。只有水质清澈，才能满足黑鹳的捕食需求。”



著名鸟类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高武介绍，此前黑鹳很少光顾北京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筑巢地和食物来源。现在北京整体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甚至已经超过黑鹳的栖息要求，种群数量增加、生活范围扩展也就顺理成章。鸟类是衡量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完整性和生态质量的指标性动物，它们在一个地区的栖息情况变化可以说是生态环境的风向标。

包括永定河流域房山段在内的房山诸多地区，近年来不断加强水生态治理，围绕构建流域相济、生态健康的水网系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受益的不仅是黑鹳，包括天鹅、金雕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数量都在稳步上升。

2021年3月20日，永定河上薄雾弥漫，我在永定河房山段再次拍到了10余只黑鹳起飞盘旋的场景。

据了解，自2020年秋天大批黑鹳重返永定河后，这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认为，黑鹳已经平安度过越冬期，在永定河安了家。

清晨，十几只黑鹳在永定河上集体飞翔，场面相当震撼。自去年10月我拍到近20只黑鹳重返永定河后，每周都要到永定河上转转，期待着再见到这种珍稀的大鸟，就连严冬时节也偶尔能见到几只。开春之后，见到它们的概率大大提高了。这群黑鹳喜欢在浅水区域活动，特别爱吃永定河里的小鱼小虾。

此外，我和其他摄友还在永定河房山段多次拍摄到大鸕、毛脚鸕、黑翅鸕、天鹅、白鹭、苍鹭等珍稀鸟类。



## 专家来房山考察生物多样性

2021年3月，北京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专家钟震宇、王丽斌，《北京日报》记者陈强等就生态环境治理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在房山调研。据专家组中的鸟类专家记录，仅一日内就发现39种各类珍贵的野生鸟类品种。目前北京地区已经采集标本的鸥类鸟有9种，其中房山区发现3种：三趾鸥（罕见冬候鸟）；银鸥（冬候鸟、旅鸟）；海鸥（旅鸟）。



## 永定河新一轮补水计划

2021年4月，北京市水资源调度中心会同永定河管理处、官厅水库管理处、河湖管理处，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的水务局，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等单位，认真分析研判流域当前水情、工情，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科学编制水量调度方案，



于 23 日起调度官厅、斋堂水库增加向永定河北京段补水量。

其中,官厅水库出库流量由 2 立方米 / 秒调增至 10 立方米 / 秒,计划至汛前出库水量约 0.5 亿方,将水库蓄水量控制在 4.9 亿方左右;三家店枢纽调蓄来水,向永定河平原北段和城市河湖水系补水。斋堂水库按照小流量方式出库 250 万方,改善永定河支流清水河生态环境。

此次调度工作,市水资源调度中心对接海委 2021 年春季永定河生态水量调度安排,多水源统筹优化调配,增加永定河生态水量的同时有序调控官厅、斋堂等水库蓄水,保障汛前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保持永定河山峡段流动和持续补给地下水,同时恢复永定河干流三家店至卢沟桥河段和永定河支流清水河水体流动,增加非汛期本市有水河长;“优水优用”,利用官厅水库水源向城市河湖补水,保障城市生态用水。

接下来,房山区将继续做好自然生态管理工作,完善保护地规划布局,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全面加大对自然保护地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和频次,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和“两山”基地申报工作,以创建工作为契机,持续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将下大力气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为野生动物栖息打造更好的生态环境,为“一区一城”新房山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鸟儿驻足这一片宜居之地,用翅膀给房山的绿水青山“点赞”。

4 月 29 日,为进一步反映永定河生态变化,迎接新一轮补水工程,北京市水务局永定河管理处组织去年拍摄“黑鹳栖



居永定河”的我及相关人员考察永定河山峡环境，对沿途的生态景物叹为观止。

日前，顾梦红老先生给我发来《房山文史资料》十一集刊载的原房山区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我的岳父毛锡恩撰写的《我当乡村教师的回忆》文章，了解了很多儿女都不知晓的故事。昔日老人家在永定河畔当人民教师，今天我用相机记录永定河的生态变迁，历史传承，感慨万千。我将不遗余力聚焦房山记录家乡生态变化，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讲述人、图片：赵永祥）

（资料整理：刘卫峰）



## 探寻房山蕴藏的历史文化

赵永祥\*

北京群山环绕，山涧众水入湾，冲积形成平原。大体来说，平原在紧邻山区的地方，是粗沙砾区，紧邻粗沙砾区的外侧是河流冲积形成的沙带，广大平原的中心地区则由黏土和黄土覆盖。远古时期，北京地区平原多为漳泽之地，人类早期的活动就出现在山地森林与平原沼泽两种生态系统的交汇之处，时至20世纪末，这条沿着浅山分布的边缘地带，依旧是北京南下的主要通道。

今天，随着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大兴机场的投入使用，以及北京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当我们从太空来鸟瞰：太行山之首“西山”与海河支流“永定河”的一撇一捺，构成了北京城市地区的十字骨架。

房山，就在这两笔的交汇之处，涵盖了从群山到浅丘再到平原的自然地貌。溯本清源，从靠近周口店河，切入北京城市地区的龙骨山，到琉璃河凸岸的高台阶地，再到永定河不定游

---

\* 赵永祥：房山区政协副主席



荡的“水中可居住之地”，北京地区的人类活动历程，实际上也是人与水互为试探，逐渐磨合，并最终和谐相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原始聚落、城市萌芽、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等历史阶段。房山，正是在这一历史舞台剧中最先登场。

房山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数量多、类型全、不断代。全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343 处、不同时期出土的可移动文物 12 万余件、地下文物埋藏区 9 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1 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0 处，市级文保单位 12 处。共有 225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项目，其中国家级 3 项、市级 8 项。周口店遗址被誉为“北京人之源”；镇江营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遗址，被誉为“先商文化之源”；琉璃河遗址被誉为“北京城之源”；金朝十七陵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帝王陵寝，印证了北京建都的沧桑。房山还有战国乐毅墓、唐代贾岛峪、宋辽古战道、145 处寺庙遗址及 112 座古塔。从旧石器、新石器直到现在，历朝历代都有印记，形成了不断代的历史画卷。

### “北京人之源”

主要以周口店猿人遗址、镇江营遗址为代表。

大约 70 万年前，在今天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北京人”开辟了家园，第一具完整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揭开了这个人类发祥地的神秘面纱。“北京人”洞穴而居，制作简单



工具，采集果实，猎取动物，利用保存的火种烧烤而食，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自然的能力。20 万-10 万年前，“新洞人”踏着“北京人”的足遗，继续行走在周口店的莽林之中。



北京人遗址

3 万 -1 万年前，已属于晚期智人的“山顶洞人”，体质特征基本与现代人相同，从出土的大量饰品来看，他们已有了爱美的追求。4. 2 万 -3. 85 万年前，田园洞人与山顶洞人同属于晚期智人，根据出土脚趾骨化石推断，他们已经学会了穿鞋，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最早穿鞋的古人类。

镇江营遗址，作为北京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出现在 10000-7000 年前，此时的先民已经结束择洞而居，学会搭建半地穴式的茅草棚居，陶土而炊，削石为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始聚落得以出现。人类早期的活动在房山这片土地上连绵不断，形成了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积淀，也形成古源文化。

## 城之源

生活在北京平原的古代居民，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有了商品交易与公共议事



西周燕都遗址

的场所，进入了早期的城市萌芽阶段。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国，定都建城于现今琉璃河岸的高台地，此时的人们已经使用工

具去砍伐树木，建造宫殿，制造青铜用具和武器，在城市周边生产劳作，并为城市居民提供能源和物资，北京地区也开始进入城市国家时期。西周燕都遗址，位于今天房山琉璃河镇，基本分布在董家林和黄土坡两个自然村，是北京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市遗址。燕国立国前后达八百余年，历西周、春秋、战国，作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其所建的初都、上都、中都、下都等，都曾是古代幽燕地区城市建设中的杰作，而作为初都的房山琉璃河燕都，则是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发轫之作，也为北京地区进入强盛的领土国家时期奠定了基础。先人最早选择在房山这片土地上营国安邦，留下了璀璨的人文遗产，积累了丰富的空间经验，也使得房山成为北京地区的城之源，文明之源。

### 地质文化资源

房山是地学摇篮，地质公园概念诞生地。房山是中国地质工作研究最早之地（1867年），是中国地质工作者的摇篮，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概念诞生地，是全球第一家位于首都的世界



地质公园。

——石花溶洞群观光区，主要由石花洞、清风洞、银狐洞、唐人洞、孔水洞、和上方山云水洞和张坊仙栖洞组成，



大小溶洞近百个。以石

石花洞

花洞为代表的溶洞群是我国北方岩溶洞穴分布最密集、最大的溶洞群，尤其是石花洞在国内和世界上具有洞穴层最多、洞内次生化学沉积物类最齐全、发育最完好等特点。

——十渡岩溶峡谷综合旅游区，是华北地区最大、最典型的岩溶峰丛峡谷，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十渡山水甲桂林之称。壁立万仞的峰丛、造型奇特的溶洞、不同类型的沉积构造、变化多姿的河流地貌构成丰富多彩的地址遗迹景观。园区内水绕青山，人在画中，青山野渡，百里画廊，是科普教育和休闲旅游必到的景区。



圣莲山

——上方山云居寺中国传统文化游览区，上方山拥有华北地区唯一保存最完好原始次生林，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上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



90%以上。园区内地形崎岖、峰岚峭拔，九洞十二峰最具代表。历史上素有“南有苏杭、北西上方”之说。云居寺和石经山是佛教圣地，所藏万余块石经、两万余纸经、七万余块木板经堪称“三绝和国之重宝”。云居寺景区内众多人文足迹与自然景观交映生辉，形成了“西天洞奇、古龙吐珠、圣水珍泉、翠谷辰阳、塔秀竹翠、御笔龙碑、群塔烟云”等极具特色的云居八景。

——圣莲山观光体验区，被誉为京都第一奇山，不仅有独特的第四纪洞穴沉积遗迹——“圣米”，还拥有深厚的人文积淀，集雄、险、绝、奥、秀于一体，融自然风光、古典建筑、地质遗迹和历史文化为一域。圣莲山古称太山，昔日摩诃祖师道于此，食石米、饮圣泉、得道升天。此山佛道文化并存，现存的长星观、长生观、圣母宫、圣水洞、蟠桃宫属明显道家建筑。此外，山上还有民国达官曹锟和梨园名家杨小楼的消夏别墅。

——百花山、白草畔生态旅游区，主要的北方高山草甸和原始次生林生长区域，是消夏避暑的胜地。



百花山

## 石刻文化资源

房山大理石资源丰富，是工匠汇聚之地，拥有住建部认定



的 001、002 号国家级石材，以及经过千年雕刻的石刻、石雕等，堪称石作文化的故乡。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现存 7 座唐塔、5 座辽塔，珍藏并展出石经、纸经、木经版等珍贵文物。其



云居寺

中，尤以 1122 部、3572 卷、14278 块石刻佛教大藏经著称于世，其历史久远，工程浩大，刊刻宏伟，被誉为“国之重宝”“石经长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石刻图书馆。传承着“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房山石经精神。大石窝汉白玉白如雪、坚如玉、面如霜，清润素雅，庄重伟岸的个性伴随着千年石经的刊刻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睐，成为艺术雕刻、古代宫殿、陵寝、庙宇、桥梁、园林等建筑的重要用材。国宝“汉白玉”及其雕刻奠定了古都文明的基石，北京十大建筑中有 9 处选用了大石窝汉白玉，如故宫、颐和园、天坛、十三陵等。今天，房山的石作产品已经遍布中国和东南亚。

## 皇家陵寝文化

主要以西周燕国贵族墓、金陵遗址、清代褚王贝勒园寝、明永安公主墓等为代表。



### ——大房山金代帝王陵

公元 1153 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于燕（北京），改称中都。同年派司天官于燕山勘陵。贞元三年，海陵王命以云峰寺为山陵，此后经海陵、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五世 60 年营建，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北域达 156 里。

共有 5 个陵区：九龙山、石门峪、峨眉峪、断头峪、康东峪。

九龙山太祖陵区，先后葬有 7 陵 1 墓：太祖睿陵、太宗恭陵、德宗顺陵、睿宗景陵、世宗兴陵、显宗裕陵、章宗道陵和梁王宗弼墓。

石门峪十帝陵区，葬有 10 位金立国前部族首领追谥之帝：始祖丕普、追谥景之帝，子德帝乌鲁、追谥德皇帝，子安帝跋海、追谥安皇帝，子献祖绥可、追谥定昭皇帝，子昭祖石鲁、追谥成襄皇帝，子景祖乌古乃、追谥惠恒皇帝，世祖劾里钵、追谥圣肃皇帝，肃宗颇剌淑、追谥穆宪皇帝，穆宗盈歌、追谥孝平皇帝，康宗乌雅束、追谥献敏恭简皇帝。这 10 帝原葬于上京会宁府，海陵王于贞元三年迁入石门峪陵区。

峨眉峪熙宗思陵，金代第三位皇帝熙宗迁葬于此，号思陵。熙宗悼屏皇后裴满氏也附葬于思陵。

断头峪坤后陵，葬有乌林答氏等 6 位后妃。

康东峪陵，葬有卫绍王永济，泰和八年（公元 1208 年）继皇位，至宁元年（公元 1213 年）被叛军所杀，降封东海郡侯，贞祐四年（公元 1216 年）。追复卫王。

明代晚期，女真人后裔满族人在东北崛起，萨尔浒之战和



绵州之战明军一败涂地，明统治者惑于形家之说，认为满人的祖陵大房山王气太盛。所以，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派出大批人马，拆毁金陵所有建筑，砍龙头，刺龙喉，断地脉，除馨宁宫改为佛寺幸免，其他建筑尽被夷为瓦砾。清朝，顺治、乾隆、道光年间又有修复。清末民初，兵劫匪祸，金陵尽毁。

### ——明永安公主墓

位于阎村镇公主坟村，目前已圯废无存。永安公主名玉英，为永乐皇帝长女，生于洪武十年（1377 年）七月十五日，薨与永乐十五年正月初九。

### ——清代褚王贝勒园寝

清代共有 33 位亲王郡王葬于房山，形成了 6 处大型墓群即：敬谨亲王家族园寝、顺承郡王园寝、庄亲王府园寝、淳慎郡王园寝、惠亲王府园寝、克勤诚郡王园寝，此外贝勒奕绘也葬于房山大南峪。

1. 敬谨亲王府园寝，位于长沟镇东甘池村，分东西两区。东区占地 40 亩，葬敬谨亲王尼堪和敬谨悼亲王尼思哈；西区占地 35 亩葬有尼堪长子兰布。

2. 顺承郡王府园寝，位于长沟镇西甘池村和韩村河镇二龙岗村。西处顺承郡王府园寝占地 250 亩，葬有 14 位顺承郡王：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勤尔锦、勒尔贝、延奇、充保、顺承忠郡王诺罗布、顺承慎郡王恒昌、顺承简郡王伦柱、顺承勤王王春山、顺承敏郡王王庆恩、顺承质郡王讷勒赫、顺承郡王锡保、顺承恪郡王熙良、顺承恭郡王泰斐英阿。



3. 庄亲王府园寝，位于河北镇磁家务村，共有 7 处园寝。庄亲王为清初八家铁帽王之一，自硕塞以下共有 12 位亲王葬于磁家务园寝，分别是：承泽裕亲王硕塞、庄靖亲王果铎、庄恪亲王允禄、庄亲王弘普、庄慎亲王永瑞、庄襄亲王绵课、庄亲王奕卖、庄勤亲王绵护、庄质亲王绵晔、庄厚亲王奕仁、庄亲王王载勋、庄恭亲王载功。

4. 淳慎郡王府园寝，位于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南。陵寝内葬有淳慎郡王弘曠、弘曠嫡福晋、大侧福晋及弘曠子孙永鋈、绵清、奕樑、戠毓。

5. 惠亲王府园寝，位于青龙湖镇崇各庄村，葬有惠亲王绵愉、其第五子奕祥。

6. 克勤诚郡王府园寝，位于青龙湖镇上万村，葬有克勤诚郡王晋祺。

7. 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位于青龙湖镇上万村大南峪。奕绘是清代著名宗室诗人，著有诗集《妙莲集》、词集《写春精舍词》、诗词合集《明善堂文集》。奕绘嫡室贺舍里妙华亦能诗，著有《妙华集》，侧室西林太清（顾太清）是清代著名女词家，著有《天游阁集》等。

奕绘曾到房山广为游历，并营大南峪别墅而居之，薨后与顾太清葬于大南峪。

### ——历代名人墓

1. 战国名将乐毅墓，位于良乡镇黑古台村西北，占地 2400 平方米。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名将，曾统燕军连下齐国



七十余诚。原墓建筑已无存。

2. 汉将军纪信墓，位于韩村河镇韩村河村公园北侧。纪信秦末投刘邦，骁勇善战，由士卒积功至将军，项羽围荥阳时舍身救刘邦而亡。

3. 唐诗人贾岛墓及贾公祠，位于石楼镇二站村。贾岛，字浪仙，范阳人，是唐代著名诗人，作诗刻苦求工，诗风淡素，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有《长江集》10卷，《小集》3卷，诗390首。原墓因岁久荒没碑断，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监察御史卢其按访贾岛墓，辟地三亩，请大学士李东阳另书一碑立于墓址。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房山县知县罗在公贾岛墓并创建贾公祠，1956年贾公祠被拆，2003年区政府重葺家盗墓并重建贾公祠。

4. 元代画家高克恭墓，位于房山城关羊头岗村。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又号房山道人，元代著名画家。祖先是西域人，后迁居房山，官至大名路总管，追赠大中大夫刑部尚书。

元定宗三年（公元1248年），高克恭在房山城东北的羊头岗村出生，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高克恭出任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入朝为工部侍郎，大德元年（公元1304年），任吏部侍郎，8年后任刑部侍郎、刑部尚书。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山水画家，擅长山水和墨竹，艺术上与赵孟頫齐名。当时人称“南赵北高”。代表作《夜山图》《秋山暮霭图》《青山白云图》《墨竹图》《云横秀岭图》《春山



欲雨图》等。高克恭博学多才，除绘画外还雅善诗词，著有《房山集》《高文简公集》。

5. 清华文殿大学士伊桑阿墓，位于韩村河镇皇后台村，墓地面积 7500平方米，墓前华表、石狮、牌坊、碑记均保存较好。伊桑阿，清康熙重臣，顺治九年进士，康熙十四年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二十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 农耕民俗文化

房山历史上曾是农业大区，在数千年的农耕、商业和民间手工艺发展进程中，产生了许多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体验农耕之乐、一解乡愁的好去处。



女子中幡表演

####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民俗文化产生、传承的土壤。在房山西部山区目前还保存着许多比较完好的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这些传统村落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依山而建，就地取材，山水自然与村落和谐统一，很好地诠释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最具代表性的有 6 个村。



1. 八卦古村——水峪。国家级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该村是明初山西移民而成村，至今有 600 多年的历史。在布局上整个村依山而建，由山岭和沟谷自然分割成东水峪村和西水峪村，一条青石砌成的 S 形古道贯穿东南西北，村落沟谷坡岭层层梯田呈八卦式布局，保留了完整的明清风格建筑群。登高下望，似两条重叠的鱼在游动，一条鱼尾甩向东翁桥，另一条甩向南岭古商道。背有靠山为玄武，前有照山为朱雀，左山青龙，右山白虎，护佑山村。

全村有古民居 100 余套、600 余间，博采众长，险山就势，人与自然珠联璧合。古树、古石碾、古商道、古庙无不尽显历史沧桑。

600 多年的发展传承，除留下了大量的明清建筑，该村还产生了许多民俗文化。如古中幡，特别是女子中幡，入选了北京市非遗名录，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演出和国庆 60 周年献礼表演。此外，还有大鼓会等民间花会。

2. 商业重镇——南窖村。该村历史悠久，公元 917 年刘仁恭就控制这一地区，公元 1126 年金灭北宋后控制大房山在周口店建祖陵，设奉先县，南窖属于陵区北域和奉先县辖区。明初山西移民带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经商理念，特别是煤矿的开发，促进了南窖商业的繁荣，使南窖成为房山北部重要的商业重镇，目前仍有保存较完好的一公里的商业古街，有商铺 30 多家，有义和祥、义和城、北大楼、老盐店、铁匠铺、果子铺、酒铺、轿子铺等。



据县志记载，清末天津商会投资举建清坨高线，使采煤业达到鼎盛，仅三安子就有煤窑 50 座，矿工 1000 多人，日产原煤 200 万斤。商业的发达也带动了民间花会和民俗文化的繁荣，每逢节日和各类庆典，本村的狮子会、炮会、银音会和周边的大鼓会、幡会、叉会和地方戏轮番上演，热闹非凡。

3. 神庙幽潭——黑龙关村。因关成村，建村历史有 1000 多年。元代奉皇命在黑龙关龙潭上方建了龙神庙，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写碑记，从此，这里成为皇家祈雨之地。到了清代更盛，雍正、乾隆赐匾赐联，嘉庆帝亲自到龙神庙祈雨。此后，在当地民间留下了祈雨的民俗文化。此外，该村建于明代的七圣贤祠，墙画保存完好，更说明了该村历史的久远和民俗文化的厚重，特别是保留完好的古民居是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

4. 圣莲山畔——柳林水村。该村成村历史已无从考证，但现存的一些明清风格的古建筑证明了该村历史的久远，龙王庙、古戏台、古民居和圣莲山的长生观、长星观把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浑然天成。

5. 高山古村——宝水村。该村处于市级保护区的核心，海拔 1100 米，村北为茶马古道，东临土虎岭、中字山台，北靠麻字岩、韭菜堰台、大黑林，西邻色树岭、大西岭，南靠中子山岭。这里山高林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过万，是天然的森林氧吧。

村内现存古宅 60 座，还有龙王庙、祠庙、古碾、古石磨、古树等历史遗存。民俗文化有山梆子戏、传统刺绣等。



6. 汉白玉之乡——石窝村。一千多年的汉白玉开采加工，大石窝镇不仅保留了“夹杆石、山神庙、鲁班庙、汉白玉宫”等有形文物和大量汉白玉艺术品。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行业习俗，如“石匠号子、石匠节、祭拜山神仪式、工匠拜师仪式”等。

### ——非物质文化遗产

房山区不仅文物古迹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也丰富多彩，特别是在社会进化发展中产生的民间花会很好地展示和传承了本地的民俗文化，是房山文化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项

(1) 明、清宫廷用酒“菊花白”酒醇制技艺。

(2) 杨家将穆桂英传说。传说在山西、河北和北京都有流传，我区羊耳峪、东流水等村也广为流传，情节与地名也非常吻合，如：“养儿峪、奶子石、拴马桩”等。

(3) 京绣。燕京八绝之一，又名宫绣，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服饰装饰，明清两代达到巅峰，是东方文化的重要表征。

#### 2-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项

(1) 大石窝石作文化（石作文化已介绍）

(2) 五虎少林会。长阳镇公议庄村尚习少林武术的历史已有 600 多年。公议庄五虎少林会是以少林武术为内核，以宋太祖赵匡胤故事《董家桥斗五虎》故事为内容的武剧形式的民间花会，是民间花会十三档的重要会档，融合了中华传统武术



与民间花会的双重文化内涵，是民俗文化的结晶。

(3) 水峪中幡。始于明初，由历代老人传习至今。水峪中幡是地区庙会、祭天祈雨、祭窑神等重要活动中的重要礼仪娱乐项目，是十三道会间会花的头档大会，也是民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表演项目。水峪中幡变化多端、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动作和套路，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真实地反映了当地民俗、民风，对研究山区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4) 灯彩制作技艺。源于清宫，传于民间，目前传人为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张连友，他不仅掌握了灯彩制作技艺，还掌握了叫卖等习俗，是民间各类传统节日和民间庆典不可缺少的饰物。

(5) 北窖村狮子会。北窖村有五档民间会花，狮子会为五会之首。创花已 300 多年，可考 201 年，传承七代。北窖狮子会传承清晰，舞狮动作特点突出，民俗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

菊花白酒醇制技艺，杨家将穆桂英传说和京绣既是市级非遗，也是国家级非遗。

### 3-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0 项

在 30 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其中有 8 项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中有 3 项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市级以上 8 项，区级 22 项。

(1) 宋氏杂技。传自北京天桥老艺人朱国全，目前代表人物宋氏五兄妹，主要表演的节目有“双风贯耳、钉板卧叉、



银枪刺喉、宝剑刺喉”等硬气功。

(2) 油酥烧饼。秦德泰油酥烧饼是房山地区有特色的传统食品。秦记源自山东，清末移居房山，就地创业开店，成为房山特色传统小吃，深受房山人喜爱。

(3) 河北村高跷会。成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传承了九代、160 多年。河北村高跷会为花会的一种，十二个角色：陀头、卖豆子的、公子、座子、渔翁、樵夫、卖药的、渔婆、卖花线的、打花鼓的等。会中 12 个角色各有不同的脸谱和行头装扮，蹬上 5 尺 5 寸的脚子，踩着锣鼓点，列队进行表演。各角入场后要唱会曲，会曲是专用高跷调儿，唱词多为古代名人逸事、英雄故事、神话和民俗等。

(4) 山梆子戏。芦子水村山梆子戏班已有 300 多年历史，曾为隗氏戏班，清代得名天成班。山梆子戏唱腔高亢有力，曲调优美，板式清晰，曲目保留较完整，多达 120 余出，是独具地方特色的戏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5) 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张金龙，学自天津魏氏风筝和曹氏风筝技法，后将中国画工笔重彩绘画理念运用于风筝图案，推陈出新，不仅提升了风筝的可视性，更提升了飞行性能。

此外，还有林氏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笼屉制作技艺、太手鼓、吵子会、大鼓会、音乐会、狮子会、田氏阴阳八卦掌、大悲陀罗尼拳、四弦、隗氏祭祀习俗、龙王庙祈雨习俗、灯花会等。



## 藏在深山里的“定兴媳妇村”

朱祥秋\*

大石河畔的深山中有个小村子叫西安村，地处佛子庄乡东南部，原称西庵。因地处英水村西，又有座尼姑庵而得名，后谐音为今名；另一说因村址位于大南山西麓山鞍上，故得名。村址海拔 480 米，有耕地 127 亩，种植玉米、谷子、白薯，产板栗、核桃、柿子、花椒等。地下煤炭资源丰富。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煤炭开采方式极其落后，出煤量少得可怜。再加上靠天吃饭的土地收成不佳，每家每户连填饱肚子都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靠着集体的力量，政府的支持，煤炭开采的产量在逐步提高，村民不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村里的大姑娘还照样都嫁到了山外，而村里大小伙子的家人们只能四处求人说媒，娶那些来自生活条件更差地区的媳妇。

三年自然灾害使得莽莽大平原都饥荒遍野，尽管这里也到了靠吃野菜树叶、啃玉米芯树皮等辅助充饥的程度，但富在深

---

\* 朱祥秋：房山区佛子庄乡学校教师



山有远亲，村子由于人口少，山上可食用的天然动植物资源多，没有出现饿得人起不来炕甚至饿死人的现象。这样一来，房山周边河北省境内的一些待嫁的姑娘为了给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就远嫁到了这里，其中就有一两个来自河北省定兴县。

“文革”期间，村集体的煤矿一直在生产，这就保证了村民的基本生活。这里成了山外平原地区的姑娘们婚姻首选地之一。先前来自河北省定兴县的那一两个媳妇自然也成了红娘，承担起了最早的房山和定兴两县之间的联姻使者。

她们先把娘家到了待嫁年龄的姐妹带来村里串亲戚，到北京城里玩，其实就是给村里到了结婚年龄小伙子的人家提供相看的机会。哪家看中了，自然就会上门提亲。如果姑娘愿意，这亲就结成了。

就这样，一个带一个，一个又带多个。几年间，村子里新娶进的几十个媳妇中来自河北省的占 80%，而其中来自定兴县的就占 90%，村子被大家称为“定兴媳妇村”。

之所以来自定兴县的媳妇占绝大多数，多数是亲戚套亲戚。那时本人的岳母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了自己的亲小叔子，来了个亲上加亲。彼此知根知底，不致给日后生活留下婚姻隐患。

定兴媳妇会持家。她们能吃苦，天生的聪慧勤快，把一家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即便到了后来，生活富裕了，好多年年轻人还是愿意找会过日子的定兴媳妇。本人丈大爷家的五个兄弟中就有四个娶了定兴媳妇，羡慕旁人，被传为佳话。



定兴媳妇不仅把家里打理得妥妥的，还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下地劳动。有了吃苦耐劳的定兴媳妇的带动，使村里的苦活累活不再不好安排，相比之下那些男劳力再也没有偷懒的机会了。

大家齐心干，生活就会越来越好。每到年终结算，村子的工分值在全公社总是排名第一。客观地说，定兴媳妇功不可没。

定兴媳妇在饮食改良上做了贡献。她们能把烙玉米面嘎嘣饼做到了极致，她们用自己的巧手在食物匮乏的年代把最简单的食材做成了村子里的一道老少皆宜的美食：先用滚开的热水和玉米面（这样玉米面才黏性更强，容易成团），擀成薄饼。烙好后，让它自然干透。抹上自制的面酱，裹上自己喜爱吃的大葱、蔬菜叶、野菜叶和浸泡过的可食树叶等，咬上一口，嘎嘣脆，面香无比。我就常常吃到岳母烙的玉米面嘎嘣饼，至今还回味无穷。

定兴媳妇也擅长针线活。在农闲时，她们聚在一起打毛衣。整个一家人，乃至一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秋冬天穿的毛衣都出自她们闲不住的手。毛衣不但穿着舒适，而且花样翻新。

另外一个绝活是纳十字针的鞋垫，应该是当下流行的十字绣的前身。针法虽然简单，但要把图案纳得栩栩如生



打格直接纳制的  
鞋垫



送给结婚新人的  
鞋垫



入，却是需要一定功夫。而且还要根据不同场合穿着需求设计图样。比如刚刚结婚的新人的图样就要有喜结良缘、出双入对等之意，那鸳鸯和并蒂莲等就成为首选。

在一双小小的鞋垫上，密密的针线纳出定兴媳妇的实心实意。垫在脚下的鞋里，结实耐用，还给脚底板按摩，也不失为具有乡村特色的艺术品。

改革开放带来了好政策，政府鼓励村级企业开采地下煤炭资源，并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样，村里的煤炭开采方式有了质的飞跃，从纯人工到半机械化，出煤量猛增，也催生了村里的煤炭运输业。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更向往山外的现代生活。

此时，房山西安村人和定兴媳妇孕育的第一代后人已成为村民致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站得高，自然看得远。

国家又适时出台了新的产业政策，村子明确了要大力发展绿色种植、特色养殖、民俗旅游和出山入川的总体思路。投资120多万元整修田间路8公里，修建蓄水池10个、集雨工程4处，架设引水管路4000多米，完成退耕还林200亩，种植菊芋葛根等150亩，新栽种各种果树17500株，绿化造林580亩，养殖柴鸡600多只。还投资在良乡建设了2400平方米的商饮服务楼，成为村子在良乡的大本营。

随着村子被定为生态涵养区，煤矿限期关闭，退耕还林，让贫瘠的土地休养生息。村民全部搬迁出村，大部分迁至良乡



东羊庄村，即现在的良乡大学城西北部。

为发展民俗旅游业，村子整村搬迁后，针对原村落村民宅基地长期闲置，从保障搬迁村民长久收益及推进山村经济转型着眼，发挥本村植被丰富、临近著名景区银狐洞等综合优势，积极引进山外实力企业合作开发闲置的村民宅院，在不改变村集体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发展“山庄经济”，建成了旭阳山庄，促成了山外高端要素与山区资源高度融合。

自 1996 年始，村子多次被区乡两级评为“房山区五好村党支部”“房山区文明村标兵”等。2005 年起，村子连续四年被评为“首都文明村”称号。2010 年村集体资产总额高达 1265.9 万元。

这些荣誉的取得，作为贤内助，几代定兴媳妇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说起定兴媳妇走娘家，虽然路途不近，但她们总是能巧妙把两边的主要需求达成。起初回娘家，只能将村子里特有的山货带回去让娘家人尝尝。而回来时确是两个大提包，里面装满了村里只能到过年才能吃到的白面，让婆家人多吃点细粮解解馋。后来回娘家，从家出来时只带钱，等到了良乡坐公交车之前，买些北京的特产带回去。而回来时，也只简单地带些有娘家特色的吃食。再后来回娘家，随时带着钱开着车直达而去，回来时后备厢被娘家人塞得满满的，不要都不行。而自己在给娘家人想吃什么买什么时，同样是不要硬给。

现今，从平房小院就地上楼，真正成为良乡城里人，家家



户户达到了准小康水平。每家的男孩子能娶定兴媳妇的人少之又少了，但曾经被称为“定兴媳妇村”的名头却依然还在，这应该是定兴媳妇的后人们对长辈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在京津冀协同大发展的今天，房山西安村人和定兴媳妇孕育的第二代后人也都相继结婚生子，甚至有的家庭都已是四世同堂了。而曾经年轻的第一代定兴媳妇们虽早已两鬓染霜，但个个却老当益壮，不享天伦之乐，只想发挥余热，为“定兴媳妇村”再助力一把。



## 民国名人咏莲花山和瑞云寺

赵思敬\*

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平台”，刊登国家自然资源部推出第二批生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向各地推荐 10 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学习借鉴。值得自豪的是我区史家营乡名列其中。今年以来，史家营乡结合“红色之乡、生态之乡、旅游之乡”的三乡战略，着力推进文化建设，在学习古典诗词方面独树一帜，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被北京诗词学会授予“中华诗词之乡”称号。为此，挖掘整理史家营地区前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现在，根据民国十八年也就是 1929 年出版的一本《游山专号》，将民国年间一批文化名家游览史家营乡域内莲花山和瑞云寺写的作品加以整理，呈现在读者面前。

---

\* 赵思敬：房山区文联原秘书长



## 一、莲花山诗话



圣莲山

圣莲山原名莲花山，山峰峻秀，林木丰茂，为百花山之精华所在。可以说，民国以来就有“不到莲子峰，等于没有到过百花山”之说。因为，它荟萃了百花山

的灵秀纯美。莲花山既有佛教，也有道教，还有名人别院。民初以来，庙宇繁盛，游人不乏社会名流。早在 1929 年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徐森玉和好友江翼云、周立之、凌直支等六位先生，用了六天时间，游览了百花山风光，同时留下了有关莲花山的诗作 30 多首。为保存史料，现选出 15 首分述如下，先看江翼云的几首诗：

### 登莲花山

晓起欣看屋角晴，昨宵雨肯阻山行。  
 尘心顿为松风静，尺地难逢石径平。  
 渐觉宿烟添暝色，似闻远涧有湍声。  
 登临自是须腰脚，不负攀跻一往情。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前一日在山下住宿，夜间下起大雨，第二天早晨，青山欲滴，作者便于山中漫步。本以为夜雨会阻断行程，没想到天助雅兴，大有苏东坡“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边积雨声”之慨。山路难行，尘心如松，登山自然是一件苦乐相伴之事，人们为什么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感觉？除了对大自然的向往，还有好奇心的驱使，也有探索发现的急切之情。美景怎能在一个角度看尽呢？风景如画，一般不在寻常人所到之处，往往需要经过沿着崎岖小路艰苦地攀登才能“一览众山小”。除了需要腰腿之力，还有就是不能辜负了朋友的一片真情而落在后边，正所谓“不负攀跻一往情”也。作者还有《莲花山中》诗一组如下：

### 长生观

长生观是古禅关，新拓松梢屋数间。  
他日相思忘不得，今朝生日在仙山。

### 圣米石塘

故刹无僧剩石塘，流传圣米事荒唐。  
山光莫讶须臾改，飞雨初过又夕阳。

### 圣泉

苹果香闻后殿花，雨飘松翠落檐牙。  
圣泉芳冽无多水，煮出山中自采茶。



### 石梁

缓步微吟度石梁，天风浩浩袷衣凉。  
更须鼓勇绳崖下，铁炼飞悬十丈强。

### 别蔡道士

空谷春来有足音，道人送我亦情深。  
看山莫负重来约，涧水岩花鉴此心。

这组诗告诉我们许多莲花山的信息。第一首《长生观》说明，作者一行人昨日还住在瑞云寺，今天便来到了长生观，这个道观原来是禅堂，生日之时，“天命”之年有好友做伴，又有仙山游玩，岂不也是神仙吗？第二首《圣米石塘》，对摩诃捣石成米之事予以否定，认为这是个荒谬的传说。第三首《圣泉》透露出一个历史事实。五代时刘仁恭于百花山建大安馆，禁止江南茶商入山贩茶，自采山中草叶为茶。这个记载，屡见于史书，诗中“煮出山中自采茶”便是这一习俗的延续。这种充“茶”的草叶，就是中药黄精的叶子。至今，史家营一带的山民，仍保存着这个习俗。这个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习俗，可在民俗志上大书一笔。第四首《石梁》讲的是天生桥阎王爷鼻子那条陡险的山路，须攀十丈之铁链上下。无路可走，只有“鼓勇”而行。第五首《别蔡道士》，说明道长待人热情，并留下“看山莫负重来约”之邀。

周立之也有两首诗，分别写于长生观和题写在圣米石塘。



先看第一首：

莲花山长生观

白莲承玉座，中有一峰高。  
山爱螺旋上，人惭鸟度劳。  
乳泉清石洞，道士紫眉毛。  
长啸邈鸾凤，松风送海涛。

圣米石塘题壁在南寺长春观前

南寺纾余北寺奇，如从鸟道度峨眉。  
劳人到此心皆逸，海雨天风及我思。

诗作平平，没有什么新奇之句。同样，第一首中“道士紫眉毛”，说明蔡道士等人把眉毛都染了，这个做法可能与“紫气”有关。染眉不光是信仰问题，还有“统一标识”的作用。历史上的“绿林”“赤眉”军，都有染眉的要求，杜甫有诗劝诫朝廷不可小看山民造反，说“绿林宁小患，苍生可察眉”。“察眉”指的就是这件事。道士染眉始于何时，未作深究。第二首把南寺、北寺作了对比，认为南庙比较舒缓开阔，北庙比较雄险。道路险峻，遐思不已。

周肇祥是个写诗圣手，一生著述颇丰。他有《莲花山杂诗》一组，现选述如下：



咏刘仁恭

刘王宫馆早摧残，莫执图经访大安。  
炼药藏钱成底事，空留碧血雁门寒。

蟠桃宫

瑶宫新筑号蟠桃，漫羨东方食几遭。  
十种金仙犹坠劫，空劳积算比山高。

遇雨

天风次落莲花雨，点点沾衣似泪痕。  
记取朝云旧针线，春绵将卸待谁翻。

从石梁至阎王鼻而归

莫笑先生杖履轻，石梁铁绠踏来平。  
从今不蹴阎王鼻，要向毘庐顶上行。

南庙坐茶

偶来松下试南泉，擎出山茶苦更鲜。  
不待清风生肘腋，盘胸冰雪已冷然。

晚餐蜜拌麦饭

饮罢山中草药茶，又调石蜜饭胡麻。  
道甜说苦俱成妄，端的还须问自家。



选录这几首诗，各咏一事，第一首无标题，只在诗后有注说，五代时“刘仁恭后为晋人执，送代州李克用灵前，刺心血以祭，诛于雁门山下”。此诗题为我所加。我们都知道，刘仁恭父子后来失和，被其子刘守光囚禁，李存勖将其抓获后，祭于李克用灵前，斩杀在雁门关。诗人说，当年刘仁恭建的大安馆早就不存在了，即使手持《图经》来寻也无用，那些用泥作钱、藏钱于山洞的往事，已随刘仁恭的死去成为历史的记忆。第二首咏蟠桃宫寓意深刻，对蔡义先道长提出含蓄规劝，“空劳积算比山高”，似有话如鲠在喉，欲言又止，令人深思。第三首，遇雨，联想深广，有唐人意。显然，作者还没有从前一首悲伤情绪中转换过来。作者之悲，非为刘仁恭，所悲者，这段历史有许多疑问没有弄明白，至此焉有不悲之情。第四首写从天生桥至阎王鼻之路奇险。第五首写饮山茶之感。第六首最有意思，原来这里的道士是用蜜拌饭招待客人，可见，山中有养蜂习俗。除此之外，亦有记山中女道士诗，容当另文介绍。

最后读读傅增湘的《莲花山杂诗》，计九首。选三首如下：

梨园中人如杨、俞等捐金巨万，  
为之建堂修路，岁时来此习静。  
曲罢钧天涨海尘，黄金罄尽为修真。  
君看蕊阁瑶窗里，多是霞裳别谱人。  
每岁三月三日，蟠桃宫开，士女云集  
绀宇霞宫迤邐开，道人锐意筑丹台。



蟠桃三熟红檐集，齐向莲山受箬来。

蔡真师谈山中旧事（二首）

芝田不属待云封，烂煮黄精当客供。

岩蜜一杯香沁骨，蜂房知在百花峰。

晓汲时调饮涧猿，山峭踟躅昼窥藩。

真师学得斋心法，神虎宵来守洞门。

第一首写京剧名流杨小楼和一位姓俞的名角捐金莲花山达万元之事，且修建盘山路和建房屋，以为修炼真气之所。这里的俞，有可能是俞菊笙，他是杨小楼祖父的弟子，杨小楼所唱之《铁笼山》《艳阳楼》《金钱豹》等戏，皆由俞菊笙指点。诗的后两句，点出了这些“别谱人”在窗影下清唱的情景。第二首诗说，每年旧历三月三，蟠桃宫开庙会，山民和家庭主妇亦来游玩。可见，山中妇女亦加入庙会行列。最后两首，皆记蔡义先道士语，莲花山里种地随意，煮黄精当茶，采百花山岩蜂蜜，晨打山泉水，晚卧养身心。同时，向客人讲了山鬼窥视、神虎守门等故事，可见，蔡义先也是个很会“忽悠”的道长，他活灵活现的讲述，吸引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傅先生，所以才一挥而成，写诗以记其事。

翻看这些九十多年前有关莲花山的诗作，我们了解了半个



多世纪前莲花山的悠悠往事，真应该感谢这些文化前辈，这些诗作为搞好圣莲山的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 二、瑞云寺诗话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任宛平知县的沈榜，刊印了一部十二卷的《宛署杂记》，上面记载：“瑞云寺，在清水社村，即唐李克用、李存勖建亭百花山之所，有碑记云，寺始汉明（帝）时，历唐、宋、辽、金、元，至明，重修三十八次。元有赐敕，今不存。”一座寺庙在一千多年间，就重修了38次，可见人们对这座佛寺的重视。从这条记载中，可知残存的瑞云寺为清代重建。是第几次重建，已不可考。现在，瑞云寺又进行了一次大修，只可惜山门前的古松已不复存在，这是个遗憾的事。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改名为百瑞谷，寺后还修了一座七级宝塔，山门的台阶就有108节，民国十八年（1929年）周肇祥等六先生曾在瑞云寺小住，留下了许多诗作，作为史料，十分珍贵，现选解如下：

因为作者皆为莲花山游人，作者身份不再赘述。先看江翼云诗二首：

### 斋堂至瑞云寺道中

寺僻僧来导客还，几人曾到百花山。  
身临绝壁千寻上，神往前溪一水间。  
数见樵归村已近，乍疑路断岭多弯。



春寒似喻般勤意，留得朱樱待我攀。

瑞云寺题壁和沅叔韵

云出万峰巅，前村隐落烟。  
溪喧微有雨，松老不知年。  
道险偏多石，农贫少为田。  
犹能供粝食，端仗主人贤。

第一首诗，说明瑞云寺的僧人行程几十里，到斋堂川迎接作者一行，虔诚之心足以动人。由此可知，如果不是有人引路，很难观赏自然美景，感叹当今有多少人能来到这美丽而又偏僻的百花山呢。身临奇绝之境，又闻听前面山涧之溪水奔响，使人目不暇接。时走时看，山重水复，碧草岩花，幻迷人眼，那真叫一个“爽”。第二首除了写景抒情，感叹山农虽然家贫，却能以粗茶淡饭招待客人，说明主人之美德。是啊，穷困的山里人，不善言谈，惯于以行动表明自己的诚意。这种风气，保留至今，令人艳羨。

周肇祥曾多次到过百花山，这次六人成行百花山，即为先生谋划。他这次除了在瑞云寺留下“余与沅叔、森玉、静庵，乙丑八月曾来。此日重游，不胜今昔之感，而静庵则已役于滨江矣，周肇祥记”的题记，还有诗一首，加上他前次所作二首，抄录如下：



宿瑞云寺二首

瑞云何代寺，落日大安山。  
径仄绳樵牧，溪清摇珮环。  
谭惟友可，疏礼喜僧顽。  
兴废寻常事，残碑藓又斑。

俯仰今何世，空余末法叹。  
薄田僧诉苦，断塔佛幢残。  
石密风泉庄，山高木叶寒。  
会须谋小筑，晨夕恣游般。

再过瑞云寺和息庵用藏园壁间韵  
旧游曾踏百花岭，目极沧溟一抹烟。  
世事如棋经几局，天风吹袂似当年。  
残僧寄食翻成客，归隐无家况买田。  
三宿空桑吾亦愿，盘桓何幸有诸贤。

周肇祥前次游百花山为乙丑年（1925年）时隔三年，与他同游者静庵先生已经去世，睹物思人，四年前情景犹现眼前。景色越美，愁情亦甚。前二首写出寺院之破败，僧人生活之贫苦，同时感叹“末法”的到来。从残碑、薄田、断塔、幢残的特写镜头中，我们得知，91年前，瑞云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一个大胆的计划因此而生，于是，作者自然提出“谋小筑”的想法，如果把寺修葺一新，岂不可以“晨夕恣游”了吗？事隔三年之后，落差的速度增加了频率，散去的僧人不在少数，注意，本寺“残僧”，他们本来应该送上斋饭招待客人，现在反而成了“客人”向游人祈斋，衣食都难保证，就别说置庙产了。对于这些生活无望、归隐或还俗都走不通的人，只有靠客人接济度日了，真是令人扼腕长叹。难怪蔡道士将此院收买，改为道观。要不然，那些想不走的“残僧”恐无安身之所。

傅增湘先生有诗二首，一为和周肇祥韵答之，一为贺江翼云生日诗，一组四诗如下：

宿瑞云寺寻壁间旧题息庵见和叠韵答之

一榻卧松巅，前游坠螟烟。  
遗民经累劫，小别已三年。  
末运应怜佛，余生欲问田。  
与君同眷恋，林壑似栖贤。

翼云兄生日小诗奉祝，时同住瑞云寺（四首）

黑头了却三公事，君早抽身我退闲。  
自分与君缘不薄，又来运骑看春山。

山深寺古得春浓，绿饮红酣洒满钟。



醉指百花陀上望，祝君身似不调松。

天花五色佛光莹，仙药珍苗不可名。  
手挹灵泉烹圣米，从君洞里学长生。

平生雅意在林泉，俊侣相逢岂偶然。  
寻向高堂话游事，为言健步尚如仙。

第一首诗说，这里的百姓虽然生活在深山，但仍免不了遭受“劫难”，而且是一“劫”再“劫”，一个“累”字，使人欲吐无声，欲歌无言。老百姓生活不好，礼佛的香火自然不旺，所以“佛”的日子也不好过，佛的兴旺与否，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这个规律，历来如此。更不要说又遇到了“末法”时期，佛，真是大慈大悲，让人遐想无际。后四首比较有趣，几个人在瑞云寺小住时，正赶上江翼云 52 岁生日，文人相聚，不可无诗，况有此幸事。大家作诗祝贺，联想到此山此景，多用百花山中事为句，从“自分与君缘不薄”，到“祝君身似不调松”，再到“手挹灵泉烹圣米”，想到六个人在山中相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非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结果也。最后一首，劝江翼云归家后向父母叙述同游之乐，大有“却话巴山夜雨时”之慨。

最后，我们看凌直支的一首，也是和傅增湘先生之韵而成：



和沅叔瑞云寺题壁原韵

名章神妙到毫巅，面壁高吟破晓烟。  
入世无心宁独我，从游有约已三年。  
快携藜杖探云壑，愁见山民辟石田。  
风雨夜窗披密笈，何人空谷问遗贤。

这首诗中说，为了这次出游，已经谋划了三年，从“风雨夜窗披密笈”一句看，瑞云寺里应有藏经之堂，否则，不会引起作者深夜研读经书的兴趣。凌先生读的什么经卷，抑或是“手抄本”，我们就知道了。诗贵含蓄，只好如此，任由我辈联想了。

将这篇《圣莲山诗话》和《瑞云寺诗话》写完，已是深夜一点钟了。窗外，刮起了西北风，我忽然有了与凌直支一样的感觉，只不过他是在读经，而我却是在探寻和阅读他们的诗作。

往事，能唤起和沟通隔代人的心灵。坐落在深山中的莲子峰和具有悠久历史的瑞云寺，化成了我牵挂的一缕白云，时时掠过思绪的上空。



## 房山境内的古井、古桥

顾梦红\*

拒马河与大石河这两条母亲河不仅滋润着数百个村庄，养育着世世代代的房山人民，更培育出房山人海纳百川的宽厚胸怀。古井古桥，水碾水磨，既是古代先民智慧的创造，给旧时的农耕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也孕育出别有特色的山水文化。

### 一、古井

房山的村落中有许多年龄逾百年的古井。大石窝村有距今400年的明代的古井，还有明代的碑文与铜钟，最古老的应该属韩村河镇曹章村赵淑云家的老宅院里那眼东汉时期的陶井。井壁由灰、红陶加砂，两种陶圈摞成，井深10.3米，水深2.4米，井圈部分深达9.9米。水质甘甜，两千年来，它默默奉献，至今仍然可以供村民饮用，浇灌园田。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东汉时期的陶井呢？

---

\* 顾梦红：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众所周知，周口店的龙骨山是中国北方最早的人类生活的遗址。琉璃河的商周遗址是 3000 多年前的燕国都城，是北京最早建城的见证。曹章村北距周口店约 20 公里，东距琉璃河 3 公里，这里有早期人类生活，形成最早的村落，应该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陶井出现在曹章村，并且不是土井，不是砖井，而是陶井呢？

大约 1 万年前，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开始了氏族生活，逐渐出现原始农业先民，不再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曹章村处于周口店西南，水草肥美，沃野千里的平原地带。山顶洞人走出龙骨山，在近处形成了房山地区早期的村落。北京文史专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房山地区地下文物发掘的研究，对照相关史籍资料，认为房山区村落的形成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发轫和初步形成时期是在新石器中晚期至秦汉之际。这时的村落不多，稀疏分布在拒马河、大石河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曹章村不仅符合这样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而且，近年来附近还有许多发掘的文物为佐证。

1981 年在娄子水村西发现 2 座汉代陶窑址，窑呈圆形，高 2 米、直径 1.8 米，出土大量陶片。周口店镇的瓦井村，唐代成村，旧时村东南有陶瓦制作的井而得名；南韩继村西，曾出土战国“明字”刀币约 5 公斤。1986 年，在石楼镇石楼粮管所内出土汉代红陶夹砂陶灶一个，陶面有三个锅，一只坐带篋子的小罐。1990 年，在阎村镇焦庄村西出土战国陶壶四件，红、灰夹砂陶鬲各一件。陶壶一件有盖，高 41 厘米，口径 11.2 厘米，



壶上有几何纹、鱼纹等。曹章村附近有这么多的村落与陶窑，出现这样的水井也不足为奇了。笔者推测，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还会在附近的村落中发现类似的陶井。

70 万年前，著名的“北京人”就在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繁衍生息。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召公奭于燕，在今琉璃河地区置燕都城。战国时期，燕国置中都县，县治位于今窦店西的板桥村。窦店距离曹章村 10 公里左右。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于燕地置广阳郡（今长阳镇），辖蓟、良乡（中都县改良乡县）。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置广阳县，隶燕国。置良乡、西乡侯国，并隶涿郡。西乡县治所在今天的长沟镇，距离曹章村不过咫尺之遥。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废西乡侯国，并入涿。查阅历史资料可以知晓，曹章村自秦汉以后，行政上始终归属西乡。千百年间，经济不断发展，人烟逐渐繁茂，因此，这里出现东汉时期的陶井不足为奇。令人深思的是，陶井历经千年风雨，没有塌毁，没有损坏，依然水量丰沛，依然可供乡亲们饮用。这说明，这里地表水很浅，陶井仅 10 余米深。两千年来，地表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与沉降。

## 二、古桥

有河自然就会有桥，房山境内最著名的古桥是琉璃河石桥，其规模仅次于卢沟桥。古今有许多文献资料记载，这里介绍几



座处于深山里的古桥。

### 大安山村的两座桥

在房山区西北深山中的大安山村，有两座古桥，经历了百年风雨，今天，仍默默地拱卫在河床之上，向过往的行人述说着曾经的风云变幻，岁月沧桑。

重善桥位于大安山村北的大北河之上，光绪丙申孟冬建。桥南北向，为一单孔拱桥，桥长 16.5 米，宽 4 米，桥身完全用山石砌成，拱宽 7.4 米，高 5.6 米。整体保护比较完好，目前已经无人使用。

桥北山坡上立有《重善修桥碑记》石碑一通，以青石制作，呈长方形，碑高 1 米、宽 0.53 米、厚 0.12 米，无首无座。碑身字迹略有模糊，整体保存较好。碑文记载：“房山西北大安山龙头沟下游光绪戊子河决成灾，涉者多溺，玉堂日击焉。与都中朱大人嵩山……商请建桥，桥北买地长十五丈宽二丈。丙申夏，邀里人宋喜旺、张国富等，捐助松银二百金，鸠工庀材……创修大北河桥一座，里人来往便之……名曰重善桥……”落款为“光绪丙申孟冬王玉堂记，冬月于鸿远书”。

根据碑文人们可以知道，当年修桥是因为大石河源头之一的大北河经常暴雨成灾，光绪戊子年为光绪十四年，即公元 1888 年，房山区志记载，是年暴雨数日，大石河中游漫水河处洪峰流量达 5040 立方米 / 秒，河北镇一村庄数百人溺毙。大安山村也有多人伤亡。丙申年为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 1896 年，洪灾八年后，村民王玉堂与地方官朱嵩山邀请村民宋喜旺、张



国富等人商议建桥，于是买地、捐款，修桥大约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竣工后，村民往来方便。这是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为了弘扬这种精神，该桥命名“重善桥”。

护村桥位于大安山村南的河流之上，南北向，灰石砌成，长 15 米，宽 5 米。桥身为单孔，拱宽 7 米。两侧拱上镶一石刻，楷书三字：卫村河，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至今保存较完好。

当下，有一些问题令人们疑惑不解。一是这两座桥同是修建于 1896 年，为什么桥南无碑，桥北有碑？二是因为“七月十五定旱涝”，民间修桥一般是在秋天，不可能在春天和冬天。所以两桥修建几乎是同一季节，这两座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三是假定南桥先修，为什么桥北的碑文中丝毫没有透露出修南桥的信息及南桥灾害情况？假定北桥先修，南桥“卫村河”三个字透露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立碑？时过境迁，修桥人已经作古，百年之后的这些疑问，只能留给有心人去考证研究了。

### 双磨村的两座重修石桥碑

长沟镇双磨村中有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村中南北通道上有一座桥。桥北西侧立有两通石碑，记载了修桥的经过。

桥东面的石碑立于清代光绪九年（1883 年），坐北朝南，方首方座，碑高 2.45 米，宽 0.82 米，厚 0.28 米；碑座距地面高 0.17 米、宽 1.07 米、厚 0.57 米。碑额篆书：“万古流芳。”由于风雨剥蚀，碑文已经模糊，依稀可以辨识出以下文字：“厥夫十月成梁，古有定制。盖以土木为桥者也……”后面的碑文



比较模糊，大意是说，土木为桥的地方多是平原之野，水势平缓，可以涉足，绝非水势凶险之地。而这里“畿辅之地，西接太行，每夏秋之交，山泉涨发，惊湍急流，震荡汹涌”修桥不能仅靠几块木板、土石为之。碑文继续叙述道，这里修桥必须“如卢沟，如拒马那样，云舒虹卧。以石代木，乃地势使然也”。后面的碑文具体说到双磨村修桥始末。“双磨村居房邑西南，接西陵御道，近太行之麓，村之东北南旧有石桥三座，建自清道光十六年……”由此可知双磨村最早有记载的石桥修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距今已经180多年了。碑文着重记述了这次修桥的经过：“……甫经数十年，霖摧浪湍”，原来的石桥渐渐损毁，于是，“本乡善士并四方往来诸君子，捐资巨资若干，更新修葺，于癸未岁暮春竣工。从此，波涌浪奔，常倚其中流砥柱。……大清光绪九年四月立”。碑文最后刻有“王怡恺撰文，齐华龄书丹”以及修桥当事人及捐款人刘贵、刘珍等人的姓名。

紧邻光绪年的修桥碑立有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立的修桥碑刻。首刻有“双磨村重修石桥碑记”。碑通高2.5米、宽0.86米、厚0.25米；碑首高0.83米、宽0.9米、厚0.27米。碑文也已经模糊不清，依照能够辨识的文字，可知碑文大意是：自道光十六年修建石桥，至光绪九年重修，此桥已经破败不堪。而“水势泛滥与左右，不分冬夏，岁岁皆然。是故行人外来，泥泞沾濡，共嗟不便”。村人无奈，平垫沙石以方便行走，但每年山洪暴发，冲刷河道，依然难行。于是村人首事（即村干部），共襄义举，募化四方，重修村南之桥。这次重修还将桥址、桥身进行了改



动。“桥址南移二丈有奇，增修五孔。两端接砌，砥平四丈。”碑文中还叙述了这次重修，还将村南村北两桥同时重修的事情，由于工程浩大，四旬而成，费用糜多，当时所募集的款项出现了亏空，“集资一千二百余元，下亏六百余元。”亏损部分则按地捐筹。

我们从这两块碑文中可以知道，这里水患曾经十分严重，2012年“7·21”特大暴雨，洪水曾经漫过桥栏。我们还可以了解，旧时农村修桥，多是民间自发行为，热心人出面组织，村民自愿捐款，很少有政府出资。

### 北安村的永济桥

南窖乡北安村地处大房山北麓深山区，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四周群山耸立，中间坡缓地平，状如窖形盆地。北安村就处于这窖形盆地之中。这里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少雨，冬季寒冷干燥。多年平均气温约 12℃，最高温度 35℃，最低温度 -5℃，年平均降水量 650—700 毫米，比全市全年平均值高 50—100 毫米。夏季雨量集中，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85%，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北安村境内的南窖河属大石河水系，水资源相对贫乏，枯水期河道干涸，丰水期有一定量的地表水，主要由上游山坡地表水、泉水、地下水和两侧山坡雨水及地下水汇集而成。2012年7月21日，房山区遭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侵袭，全区多处发生泥石流和洪涝灾害，但北安村的河流仅仅持续了几天，



并没有给村民带来很大的灾难。

永济桥位于南窖乡北安村老村中，建于清代光绪年间，南北横跨河道之上，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单孔石拱桥。桥离河面高 4.4 米，拱宽 8 米，桥面宽 4.4 米，东西长 10 米，上有砖砌护墙，可供村里人马车辆通行。桥东侧刻铭文“紫气东来，光绪十八□年，□月重修”，重修时间为光绪十八年（公元 1892 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在桥边询问年老的村民，他们听老辈子人们讲，这座桥修建过很多次，每当桥身破损，危及行人安全，村里便有急公好义的热心人出门组织村民集资修桥，但不知道光绪十八年是第几次重修。这座古朴的石桥多年来为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便利。

如今，历经百年沧桑的古桥依然默默地拱卫着古老的村庄，桥的两端有北安村农民世代居住的农家院落，古桥西侧的桥拱之上楷书“永济桥”三个大字，这应该是朴实勤劳的北安人祖祖辈辈对这座古桥的赞颂吧。



## 良乡地区八卦掌的传承

张凯军 \*

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是由河北省文安县董海川先师创建于清末，始传于北京城。

八卦掌是近代中国传统武术当中的著名拳种之一，时至今日，不仅在中华大地盛传，还流传到其他国家。目前常见的有几大分支，分别是尹派、程派、梁派、刘派等。其传承按照二十个字排序：海福寿山永，强毅定国基，昌明光大陆，道德建无极。

在房山区良乡地域传承的以梁（振蒲）氏八卦掌为主。其中梁氏八卦掌传承的代表人物是我的恩师——原“良乡文具厂”解宝城师父。

解宝城是八卦掌一代宗师郭古民的入室嫡传弟子，“山字辈”第四代传人，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八百户村，1946年经本村亲戚引荐，来到北平崇文门北官园胡同14号，在笔帽作坊当小学徒。北平解放后，这家

---

\* 张凯军：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工会主席



笔帽作坊于 1956 年 1 月公私合营,1959 年开始陆续搬到京郊良乡城,成为国营良乡文具厂。1961 年解宝城作为公私合营中最后一批职工来到良乡文具厂。

解宝城自幼喜欢练武,体格魁梧,声若洪钟,为人厚道朴实、话语不多。在学习八卦掌之前学习过弹腿、少林等拳术。1951 年底,经张志彪介绍,正式拜北京城著名八卦掌大师郭古民先生为师,系统学习“梁氏八卦掌”“八卦子午太极拳”“直趟六十四手”“七十二招”及八卦门器械(战身枪、虎头钩、刀术、剑术)等,练功场地就是现在的天坛公园,他在郭古民老师身边学习了九年之久。

郭古民先生是河北省冀县人,幼年入私塾读书,后拜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的嫡传弟子、八卦掌第二代同乡人“估衣梁·梁振蒲”学习八卦掌。其间,郭古民先生与其师伯刘德宽、尹福、程廷华等人交好,综合各个流派技艺,是八卦掌门中集大成者,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八卦掌传播和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八卦掌理论的系统形成做出了贡献。

郭古民先生文武全才,书画、诗词歌赋俱佳,八卦掌门内的练功要诀多出自其手。每次在传授弟子新的招法时,都要先写一小纸条,书写着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练功要诀”,所以其门生大多对“三十六歌诀”“四十八法”如数家珍,对练功要领掌握的规矩十分牢固。他成年在老家结婚仅四个月后即来到北平谋生,先是给大户人家看家护院,其间兼职给布店送布匹。曾途遇诈骗抢劫,但先生功夫在身,稍加展示,劫匪即逃



之夭夭。事后，名声大振，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师大）聘为体育教员，当时在校学生好武者多为郭古民先生的学生。先生的夫人在婚后第二年去世，后终生未再续娶，一直在北京传授武艺。郭先生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年届花甲，从事的都是临时教学工作，晚年生活潦倒，由北京城内朋友和弟子接济，1968年冬仙逝，享年82岁。

郭古民先生在传授八卦掌时对弟子要求很严，提倡“温故知新、循序渐进”，每招每式不练精熟，不传下一式。郭先生弥留之际，把终生所学及心得理论由弟子刘佩福整理成册，世称《郭氏锦囊、八卦掌集成》。门下徒弟众多，有“王姓”的关门弟子学得最多、最全。

解宝城拜师后，认真刻苦，每日早晚练功不辍。每逢冬季，上下身“光杆”棉袄棉裤，没有内衣，练功之后全都被汗水浸透，回到宿舍都要放在“烤笼”上烘干。天坛公园附近有大城砖，师兄弟们都是每手托着半块城砖练功，大部分师兄弟都是有着超常的功力，出众的武功。他的师兄弟很多，有焦永贵、诸葛家宝、赵树森、李长兴、李连兴、刘佩福、王其昌等，都是北京八卦掌界的第四代名师。

解宝城来到良乡之后自己悄悄练功、秘不示人，只教给了老家自己的儿子解兆刚和女儿解兆敏。解宝城师父很传统，在郭师爷去世三年后才开始收徒传授八卦掌技艺。1971年他收了大徒弟刘群河，1972年收了二徒弟邢光。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陆续有彭占明、马良、梁明欣、张明、连玉、王立新、解开金、



周天贵、赵建国等十余人列入门墙。再传弟子有李建宝、赵同彬、石金财、张建军，张建坡、张新运、梁维、刘立强、程刚等。

解宝城师父待人和善、传授严格。授徒时他老人家的口头禅是“来得容易、去得马虎”，反复强调少练、精练，不能贪多消化不了。他对要领的掌握要求极高，反复提示，细致入微。解宝城师父强调遵纪守法，只传授徒手的武术，不教任何器械，常说：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练兵器没用，还容易受伤。所以，本门没有八卦器械传世，令人非常遗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解宝城师父为房山地区的郭古民传“梁氏八卦掌”留下了最古朴、最原始的一脉，为此拳的继承和发扬播撒了种子。此拳练法特殊，不具表演性，与市面流行的“八卦掌”有很大区别。强调一招一式中规中矩，不得马虎，讲究一手变三手，运用自如。十六字口诀是“迎翻走转、穿搬截拦、推托带领、缠扣刁钻”，突出定式走转、变式不断，要求练出缠裹劲、惊炸劲、螺旋力（螺丝转）、“一心管二”，后期有“走砖”“慢练”“太极拳”等。此“太极拳”全称：八卦子午太极拳，经刘德宽传给郭古民，再传给我师父解宝城等人。这种太极拳世间罕见，是八卦掌的要领和身法、突出拧转和腿法，步法特殊一步一“暗腿”，目前能了解到的练习者，在良乡地区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

解宝城师父在良乡传授的八卦掌包含“定式八掌”“变式八掌”“单打八式”“对练八式”“单练六式”“六把总拿”“直趟六十四手、双练”“八卦子午太极拳和定活步推手”等。此拳的实用性很强，解宝城师父曾说过自己的故事。在 1949 年



前夕，他刚拜师习武不到两年，有一天下班后回住地的路上，小胡同的路灯很昏暗，突然听到有人喊叫，师父立马跑过去一看，有个壮汉在抢一妇女的包。解宝城师父立即冲上前抓住壮汉的手腕，一个“拧棒子”，把那人掀翻在地。90年代后期解师父弟子解开金为单位追款，被五名男子围打，他一人敌五，放倒全部对方。事实证明，八卦掌以游击为特征的实战技能是很有特色的。

解宝城于 2015 年因病去世，享年 83 岁。

这些年来，解宝城弟子邢光继承师父遗志，广泛传播“梁氏八卦掌”，同师弟张凯军一起整理了“郭古民系解宝城传八卦掌教法汇编”，以飨后学。

“翠花刘”刘氏八卦掌主要流行于涿州市码头镇，是八卦掌第二代宗师刘凤春传给其子刘文华，后经刘文华等数代传播，流传至今。房山地区的练习者大部分是涿州市史建华老师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史建华老师是刘文华的入室弟子，八卦掌第四代传人。刘氏八卦掌特点是古朴浑厚、铁掌金钩，八面劲、金刚球，走转架子低，功力大。

目前比较著名的是史建华入室弟子第五代传人蔡华，多年在房良两地传播。蔡华习练刘氏八卦掌 38 年有余，架势优美，功力浑厚，下式如入海蛟龙，起式若腾飞仙鹤。目前能练低式八卦掌的只有蔡华一门了。



## 1962 年的一次高中同学聚会

宋 浩 \*

我于 1955 年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七十中，当时周口店地区属于京西矿区。1958 年 4 月，属于河北省的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并成立周口店区，北京七十中相应改为周口店中学。我在该校一直读到 1961 年高中毕业。我们是该校第一届初、高中毕业生。那届高中共两个班，到高三时分为文科和理科各一个班。

1960—1962 年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各级学校的招生规模大幅度压缩。我们这一届首当其冲，高考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周口店中学取得了当年高考的好成绩。曾经教过我们物理的李荫越老师在周口店中学建校 50 周年的纪念文章里，列出了当年我们考上高校的学生名单，相当珍贵。现抄录如下：

文科班 34 人，理科班 42 人，共计 76 人，其中薛玉贵、任淑敏、王淑兰 3 人留校任教，64 人参加高考，40 人被录取，

---

\* 宋 浩：大同矿务局设计院原院长



升学率 62.5%。

录取院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名校。

我们同学中绝大部分是农村的。农家的孩子圆了大学梦，知识改变了命运，可以说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那年没有考上大学和未参加高考的同学也都分配了工作，大部分同学当了教师。在这里，我们要衷心感谢辛勤付出的老师们。他们勤勤恳恳，循循善诱，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们永远不忘师恩，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1962年4月15日是星期日，在北京读书的周中同学相约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那天一共到了31名同学，这是那一届周中同学唯一的一次聚会。同学相见分外亲热，大家互诉衷肠，传递着老师和其他同学的消息。那时没有条件搞聚餐，集合起来之后，大家一起到了前门的“大北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那天老同学们分开后，我和堂兄宋淇（1965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公安厅，直至退休）一起到北海公园游玩，顺便在北海照了一张合影。五十多年后，再次仔细看这张照片，那时的堂兄足登解放鞋，身上竟然还穿着棉裤，是那时候的北京天气特别冷吗？不是，而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不能适应换季，除了棉衣之外没有毛衣、绒衣、衬衣之类的过渡



衣服，脱了棉衣就只有单衣。所以到了4月中旬堂兄还穿着棉裤就不奇怪了。我家里条件稍好一些，但也只是出门穿一身较好的衣服，在学校里穿的也是有补丁的衣服。我们学院有从南方来的同学一年四季都是光着脚，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

三年困难时期，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2.5元，粮食定量30多斤，2两油，肉和副食更是少得可怜。每月凭票供应半斤点心，2两水果糖。这两张票攥在手里迟迟不敢动，一直坚持到月底才敢去买，不然见到别人吃点心，心里那个馋哪简直无法形容。而手里还有票，心里总是还有点儿安慰。那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勒紧裤带，共渡难关。到1963年，形势逐渐好转了。1964年，中央批准大学生的伙食费调整为15.5元，使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周中考上大学的部分同学合影  
(第二排正中为作者)



北海公园合影：宋洪（左），  
宋浩（右）

物换星移，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现在的好日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 房山文史资料

---

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得来的。今后，我们要加强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的教育，不忘过去的苦日子，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更加美好的明天去一起奋斗！



## 良乡固村与大将军考略

赵润东 \*

古镇良乡，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不仅成为北京与中原地区连接的交通大道，被誉为“北京南大门”“陆路咽喉”，而且辖区内的村庄、古迹也各有来历。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城乡建设迅猛发展，居民社区逐年增加，传统村落渐行渐远不断消逝。近年来，良乡西潞北五村已经夷为平地，新型的现代化社区将展现在公众面前。无论是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还是乡村文化的繁荣兴盛，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在当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忘初心，记住乡愁，将农耕文化和村庄发展历史记录下来，使之成为永远的记忆，留给后人，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位于西潞街道办事处西北部的固村，东与良坨路交界，南与北潞园相连，西与大马村相邻，北与安庄村接壤。固村地处山前冲积平原，村址海拔44.9米。聚落略呈长方形，主街东西向。全村总面积 0.967 平方公里。

---

\* 赵润东：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



这里原为刺猬河冲击带，杂草丛生，荒无人烟。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大批满人“从龙”入关，随之而来的粮食供应困难问题凸显出来。据史书记载，清顺治元年（1644），朝廷下令，八旗官兵可在京畿地区以跑马形式自由圈地，由此占用了当地大量农田，这在历史上称为“旗圈”。清廷八旗官兵及家眷在当地安顿下来之后，按照爵位等级分配给各位王公和“从龙”贵族以土地，拥有大量土地者称为庄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公元 1616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公元 1626 年，努尔哈赤驾崩，其子清太宗皇太极继汗位。皇太极即位后迁都沈阳。公元 1636 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金”为“清”，史称清朝，也称大清国、清国。公元 1644 年，睿亲王多尔袞迎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统户政权。因为统治者是满族也有“满清”一称呼。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经太宗皇太极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帝统治，至公元 1911 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灭亡止，后金、清朝一共存在 296 年，经历了 11 代 12 位皇帝。若从顺治帝入关算起，共历 10 帝，统治全国达 268 年。（天命汗努尔哈赤，崇德帝皇太极，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嘉庆帝颙琰，道光帝旻宁，咸丰帝奕，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宣统帝溥仪）。



清太宗皇太极为什么改“金”为“清”呢？据史书记载，明字含火意，清字用水做偏旁，以清代明就如同以水灭火，正符合五行相克的说法，以此证明夺取明朝天下是上顺天意下应民心的事。

公元 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指挥下趁势入关，政治上推行剃发易服，军事上打击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逐步占领中国。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入关后 20 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征服中国。然后历经康雍乾三朝，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奋、勇敢的民族。原聚居于“白山黑水”的祖国东北。其源流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战国以后称“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相继称“勿吉”“靺鞨”，至宋、辽时又名“女真”。其实，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废除“诸申”（即女真）旧称，改族名为“满洲”，满洲系满珠转音，梵称曼珠师利，汉语为吉祥。

固村村民大多是满族，而且主要是杨姓、刘姓两大姓氏。其实，满语中“姓氏”一词原文为 hala（汉语哈喇、哈拉），是对氏族时期一定血缘集团的称谓。“爱新觉罗”，是清朝皇室姓氏。所谓“爱新”是族名，满语为金的意思，而“觉罗”为姓的意思。满洲姓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姓（哈拉），一



部分是基于血缘宗亲关系的族名（穆昆）。“爱新”和“觉罗”两者的关系类似汉族中某姓和某家族的关系。除爱新觉罗外，觉罗这一姓氏还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等分支，都源于同一始祖。因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该族遂成望族，以全称相称，所以“爱新”就变为姓氏的一部分。如同那拉氏有叶赫那拉、乌拉那拉、辉发那拉等分支（叶赫、乌拉均为地名），瓜尔佳氏有苏完尼瓜尔佳、安图瓜尔佳等分支一样。

那么，满族姓氏是如何形成的呢？据史书记载，满族姓氏，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地为氏”，即以所居地名，山川河流名字为姓。如董鄂氏因其族原居董鄂河得姓；二是“以部为氏”，如清皇族姓爱新觉罗氏，汉语译为“金族”，据说其先人与金代统治者同族同部而得姓。常见说法称“觉罗”为姓的意思，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将爱新觉罗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示血缘远近区别，同时将一些有功之臣赐姓为觉罗，如觉罗纳木泰（原姓舒穆禄）、觉罗吴拜（原姓瓜尔佳）等。清朝灭亡以后族人多改汉姓，如安、廖、曾、金、王、孙、艾、罗、肇、范、关、鄂、赵等，而爱新觉罗就改成了金。又因为“觉罗”一词在女真语里是“远方”的意思，所以后来就演变成了远支，由此也就与宗室区分开来，比如满语里外祖父、外祖母、外孙，觉罗其实就是远支的意思，以致后来觉罗发展成为一个姓氏。

清军入关以后，满族逐渐与汉族融合，经过近四百年历史的变迁，大多满族姓氏也随之汉化。满族姓氏汉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有的取满姓字头为姓，如佟佳氏改姓佟；有的取满姓



字头谐音为姓，如“关”是瓜尔佳氏“瓜”的谐音；有的取满姓的汉意为姓，如钮祜禄氏译成汉文意思是“狼”，其族部取“郎”为姓。还有一种改姓方式叫“随名姓”，如清皇族有叫伊勒图善的，其子便取其父名头一个字“伊”为姓。满姓改汉姓，有一姓改多姓的，如爱新觉罗氏不仅有姓伊的，还有姓肇、姓金、姓德、姓洪、姓海和姓依的等等。清朝时满族较为显赫的姓氏有八大姓，分别是佟（佟佳氏），关（瓜尔佳），马（马佳氏），索（索绰罗氏），赫（赫舍里氏），富（富察氏），那（那拉氏），郎（钮祜禄氏），俗称“满洲八大姓”。据《皇朝通志》记载，满族姓氏共有 679 个姓，而固村村中的杨、刘二姓也自然包含之中。

据说，当年“从龙”入关的杨福、杨禄是清朝的大将军，镶蓝旗。兄弟二人带着家眷，来到良乡古城西北关外三四里的太平庄村北（今北潞园西南侧健身广场一带），选择一块比较平坦的荒地驻扎下来，取名杨庄。杨氏家族落户之后，自然成了此地的庄头。他们喝刺猬河之水，收刺猬河一带土地的租子，在这块土地上生产生活，繁衍生息。随着时光的流逝，杨家代代相传，人口逐渐增多，各支不断分出，组建新的族户。

据史书记载，清康熙十年（1670 年），京畿大旱，水位下降，刺猬河水干涸，吃水浇田便成了问题。于是，杨家后代只得向北搬家迁移，另选地势较低的地方挖井取水，以供人畜饮用。到了晚清时期，杨家后代兄弟二人，老大杨文煦，老二杨文汉，在靠近刺猬河右岸的大片土地上立庄头，将其中几户周姓汉人



搬走，然后划拨地块分给杨家各户。同时，在村东又打一眼水井，以供生活饮水和田园灌溉。此后，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两位庄头如愿以偿，十分高兴，说：“咱们再也不走了，就固定在这儿啦！”时间久了，这里自然固定成村，因而取名固村。

以前，固村分为固村和杨井两个自然村。固村大部分为镶蓝旗的杨氏后代。而杨井居住的刘姓为满族、秦姓为汉族。何谓杨井呢？杨井毗邻固村，据称此地原为杨氏家族菜园，当中有井，所以叫杨家井，简称杨井。

固村杨家先人去世后留下东、西两处墓地，祖坟位于原固村小学南侧，坟墓简陋，均为土塚。以后坟地又分为东坟、西坟。东坟为老大一支，西坟为老二一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坟一支的后代逐渐迁出本村，分别坐落于长阳、吴店和丰台区铁营等地。由于年代久远，时代变迁，且无家谱流传，杨氏、刘氏和秦氏家族，只知族部，究其根祖，却无法考证。目前，二位庄头的家院也已拆除，不复存在。杨家先人在村中所栽古树早已砍伐，挖掘的那口水井也早已被封存。

关于杨家大将军，据杨氏后代传承下来的说法是，先人杨福、杨禄二兄弟为八旗子弟，而且称为大将军。因年代久远，史无痕迹，故无从考证。但是，从杨氏家族系满族旗籍和前人圈地、分田、立庄主等情况来看，作为清朝满族后裔而且曾为大将军应无可争辩，而自称是八旗子弟就有些玄乎了。

所谓八旗，是指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开始只设黄、白、蓝、红正四旗，旗皆纯色。那么，



四旗旗主是谁呢？所谓黄、白、蓝、红正旗旗主为：正黄旗旗主是努尔哈赤，正白旗旗主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正红旗旗主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正蓝旗旗主是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奇。

之后，努尔哈赤意识到政权分裂的危险，杀死胞弟舒尔哈奇、长子褚英之后，遂于 1615 年重新建立了八固山制度，即八旗组织。以初旗为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又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努尔哈赤任八旗最高统帅，指定其弟、子、侄分别统领八个旗。扩为八旗之后，旗主分别是：正黄旗和镶黄旗，旗主为努尔哈赤、正白旗旗主是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镶白旗旗主为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正红旗和镶红旗旗主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正蓝旗旗主为努尔哈赤侄子阿敏、镶蓝旗旗主为努尔哈赤第五子蒙古尔泰。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制度，是后金及清政权生存的支柱。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一种狩猎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氏族成员出猎时，每十人中以一人为首领，这十人为单位的组织成为牛录，汉意为大箭，其首领为牛录额真，汉意为主。据史书记载，1601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扩大军事力量，改牛录制为“固山制”（即旗制）。即每 300 人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意为佐领）统领，每五牛录为一甲喇，共有 1500 人，由甲喇额镇（意为参领）统辖。每五甲喇为一固山，即一旗，由固山额真（意为都统）统辖，一旗共 7500 人。

按清朝定制：“景祖以上子孙，谓之觉罗。显祖以下子孙谓之宗室。”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子孙后裔



称为宗室，定以腰束金黄色缎带为志，俗称黄带子；而塔克世的那些叔伯兄弟及其后裔称作觉罗，定以腰束红色缎带为志，俗称红带子。“凡皇帝所生子均称为皇子，待赐名后才开始按位次称皇长子、皇次子、皇三子等。皇子长至十五岁就由宗人府题请封爵，所封爵高低由皇帝钦定”。清代宗室爵位，崇德元年定为九等级，顺治六年定为十二等级。

为了强化政权，八旗编制因政治需要做出重新分配，便有了四大贝勒、四小贝勒的说法。

何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是指清代初封（王子）：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勇敢善战、多有战功。

那么，四小贝勒也是因政治利益而不断重新分配而成，如天命六年，四小贝勒为德格勒、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至天命十一年只剩下三人：阿济格、多尔袞、多铎。按照八旗编制，每旗属下均为本旗固定旗民，旗民都有固定的旗籍。

八旗中的正四旗龙首向右，龙腹内有五朵祥云，而镶四旗的龙首向左，龙腹内有三朵祥云。白旗配蓝龙，红旗配黄龙，蓝旗配红龙。八色旗除镶红旗外，都是本色旗镶红边，镶红旗镶白边。按照满族说法黄代表土，白代表水，红代表日，蓝代表天，因此用天、地、日、水代表蓝、黄、白、红。

清军入关以后，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并多为皇帝自领，地位最高，处核心地位。守卫皇城的是正黄、镶黄、正白旗。侍卫皇室的人称为郎卫，且必须是出身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的



旗人。而除三旗以外的下五旗，除守卫皇城外，大批人员则派往外地驻防护卫。这些兵丁称为旗丁，按身份地位分又为旗丁、披甲人、阿哈。旗丁即女真人，地位最高；披甲人是降人，民族不一，地位高于阿哈；阿哈即奴隶，大多是汉人、朝鲜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种族及等级观念十分明显。

凡属八旗的人，无论旗籍、住址、挑兵、选官、诉讼等，都自有体制，与一般人不同。满族人日常亦不说是满族人，而自称“在旗”。因而人们就把都有旗籍的满族人，以“旗人”相称。固村杨氏满族自称“在旗”或“旗人”，就是这个道理。

到清世宗雍正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部落的南迁，随着辖属的蒙古人和汉人来归的日益增多，除改进原有八旗外，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而构成了清代军事上八旗制度的整体，从而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这就是八旗建制的简略过程。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宗室封爵十二等级依次是：最高一级称和硕亲王，以下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未封爵位的赐以品级。

何谓“八分”呢？即八样标志：朱红（红车轮）、紫缰（乘马用紫色缰绳）、宝石顶（一品用珊瑚顶，宝石在珊瑚之上）、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盛热水用，略同今之暖壶）马坐褥和门钉（府门上同钉）。以上是用以区分“入八分”爵位等级的标志。

那么，什么是“入八分”和“不入八分”呢？清代王公降



袭次第，十分严明。礼亲王所撰《啸亭杂记》中曾有明确的解释：“国初宗室臣贵位统名贝勒。崇德元年，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辅国二公皆冠宝顶，以补服、翎服为差次，统名曰‘入八分王公’，盖即九锡意也。其‘不入八分公’以及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皆冠珊瑚顶。奉国将军视武臣正三品，奉恩将军视武职正四品，秩皆与流官宦同。旧例亲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递降一等受封。亲王众子封辅国公，亲王庶子封辅国将军。郡王以下递为降同。”

关于清代爵位的继承，也分两种方式：

一是“世袭罔替”。即封王者的子孙，每代中可有一人承袭封爵，其余按旨意不封或封其他较低爵号。那一代爵王倘若犯了法，治罪仅限本人，爵号不撤，由皇帝指定本家族中的子弟承袭。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为了褒扬八家入关有功的王爵，恢复睿、礼、郑、豫、肃、庄六亲王，克勤、顺承两郡王的原封号，并决定其子孙可以“世袭罔替”，俗称“八大铁帽子王”。

八大铁帽子王分别是：睿亲王多尔袞、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自清中期后又陆续赐封了四位，即雍正帝封其十三弟允祥为怡亲王；同治帝封其六皇叔奕訢为恭忠亲王；光绪帝封奕譞为醇贤亲王，封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奕劻为庆亲王。这样，在清代70位王中有12位“世袭罔替”，形成十二家“铁帽子王”。

二是“世袭递降”。即一代封王后，子孙除获皇帝恩准可



承原爵外，否则每代都要递降一级承袭，但始封亲王者，子孙递降至镇国公则不再递降；始封郡王者，子孙递降至辅国公不再递降。递降袭爵，随皇帝旨意，王府应调换或不换；即便不调换（或调换后），也不能再称王府，只能称府、宅、第。淳亲王府即是如此。淳亲王名允枯，康熙第七子（雍正帝之七弟），始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淳郡王，雍正元年（1723年）晋封为淳亲王。咸丰元年（1851年），淳亲王裔孙奕梁已递降至镇国公，但仍住原处未调。

清朝从入关前的景祖（觉昌安，努尔哈赤之祖）算起，至末代宣统溥仪为止，其中十代帝王之子封了王位。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子 16 个，皇太极有子 11 个，顺治帝有子 8 个，康熙帝有子 35 个，雍正帝有 10 个，乾隆帝有子 17 个，嘉庆帝有子 6 个，道光帝有子 9 个，咸丰帝有子 2 个。后代几个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加起来清代一共有皇子 113 个。这还仅仅是直系，加上旁系就更多了。据统计，清朝正式有封爵的王爷有 240 多位。

清朝宗室有五等“显爵”制度，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公爵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公爵有“功封”和“恩封”。所谓功封，即因功而封，如清初以来的八家世袭罔替王爵。所谓恩封，即降袭爵位，如皇子分封亲王，逐一袭爵至镇国公为止不再降，成为世袭罔替；郡王降袭至辅国公；贝勒降袭至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袭至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袭至镇国将军；辅国公降袭至辅国将军。镇国将军至奉国将军又各分为三等分。再往下，则为闲散宗室，用四品顶戴。典章规定，一般爵位均



为降级世袭。

乾隆时期，还特定出军功、恩封制度。此后，世袭罔替和降袭有了明显的区别。公以下的将军，虽然也分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和奉恩将军，但是职而不是爵。将军的由来，大抵是亲王的次子以下，凡年满 18 岁，大约都能得到这种职封，这叫作“应封宗室”。用考试制度，即考试满、汉文和马步箭，择成绩优秀者授封，未考中者，待第二年再考。将军以下有小世职，如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皆为世袭，这些人多为阵亡者的后裔。

那么，固山贝子、多罗郡王、贝子与和硕亲王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固山”，意思是旗；“多罗”，意思是一角；“和硕”，意为一方，即表现所担当方面的大小，如同明代以前的封藩之意。

在清朝宗室当中，有“近支宗室”和“远支宗室”之分，近支都有辈数可考，而远支则考证较难。据记载，清朝宗室在中叶时代，很少入政界任文官，多数为武职。到了嘉庆时，才有王公任军机大臣的事。再看清代的俸禄是怎样下发的呢？亲王年俸 1 万两，郡王年俸 5000 两，贝勒年俸 2500 两，贝子 1300 两，镇国公 600 两，辅国公 300 两。

再从园寝制度上看，清代也有详细的规定。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四十九“工部、园寝规制·坟茔规制”记载：“顺治十年（1653）题准，亲王给造坟工价银五千两，世子四千两，郡王三千两，贝勒二千两，贝子一千两。镇国公五百两，



辅国公同。又议准，亲王至辅国公碑身均高九尺，用蛟龙首龟趺。亲王碑广三尺八寸七分，首高四尺五寸，趺称之。世子、郡王碑广三尺八寸，首高三尺九寸，趺高四尺三寸。贝勒碑广三尺七寸三分，首高三尺六寸，趺高四尺一寸。贝子碑广三尺六寸六分，首高三尺四寸，趺高四尺。镇国公碑广三尺六寸三分，首高三尺三寸，趺高三尺九寸。辅国公同。又题准，亲王给碑价银三千两，世子两千五百两，郡王二千两、贝勒千两，贝子七百两，镇国公四百五十两，辅国公同。……”

“道光二十四年（1844）定亲王茔制，飨堂五间。亲王世子至辅国公皆三间。亲王、亲王世子、郡王门三。贝勒以下门一。亲王绘五彩饰以金，覆以绿琉璃瓦。亲王世子、郡王，只绘五彩，皆覆以绿琉璃瓦。贝勒以下施朱不绘，用筒瓦。亲王坟园周百丈，亲王世子、郡王八十丈，贝勒、贝子七十丈，镇国公、辅国公六十丈。镇国、辅国将军三十五丈，奉国、奉恩将军均三十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的衰败，诸多茔地烟祀早断，渐趋荒凉。很多寝的地面和地下遗存也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已经很难再找到其遗址。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固村被传为大将军的杨福、杨禄肯定不在清廷宗室八旗之列。但是，他们是满族旗人，又有镶蓝旗的旗籍。当年，杨家深宅大院，二进院落。长门正堂屋悬挂巨幅武将神像，身披铠甲，腰挎战刀，佩戴整齐，威风凛凛。直至“文革”前夕，每年初一清晨，村中所有杨氏后代都要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前来祭拜先祖，然后方能各自回家吃煮饺子，



这种习俗在固村杨氏家族中传承了几代上百年。

由此可以看出，杨家为正宗的满族，先祖应为“军功”“恩封”的领兵将军。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位“大将军”应为“是职而不是爵”。如此，虽为满族旗人，又有镶蓝旗的旗籍，但与清廷典章严格规定下的王室宗亲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从“大将军”传下来的土地家产和一般宅院以及东西土葬坟茔来看，既没有清廷王室后裔死后那种规模壮观的园寝墓葬，也没有达观显贵传承下来的高宅府第，更没有留下高官厚禄封赏之遗存，分析很可能是旗人中带兵打仗的“将军”或校卫，传至“大将军”的后辈，俸禄大概也就寥寥无几，甚至断绝。但是，不管如何，从杨家拥有大片土地及庄头之称来看，的确有别于一般汉民之家，总归还是拥有旗籍的旗人。

附：

旗圈 据史料记载，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满族统治者为占有田产，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解决粮食军需的燃眉之急，在京畿地区以跑马圈地方式，强行夺取了大量的耕地，历史上称为“圈地”。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1645年）十二月，清廷已在朝议“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的问题。同月二十三日（公元1645年1月20日），清廷谕令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



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这是清王朝第一次发出的正式圈地令。圈地活动由此开始展开。

怎么圈地呢？按照清廷的规定，京师周围五百里为圈地的范围，事实上整个京畿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圈占了。具体圈地办法是：由“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拔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畝亩，两骑前后率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广，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姚文燮：《圈占记》见《皇朝经与文编》卷三十一“户政三”）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八旗铁骑飞驰而过，所圈土地广阔无垠，大片耕田随即变为皇庄或旗地。据记载，房山县“十耗其七”，而良乡县耕地剩余“十不及一”。

清初大规模圈地主要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至顺治四年（1647年）进行的。据康熙四十年《良乡县志》记载：良乡县共有耕地291824.259亩，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85668.757亩；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71245.561亩；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198056.473亩。三年共圈占民地354910.691亩，



超过了良乡县耕地总量的 63146.432 亩。

在圈地中，还出现“投充”现象，即大批汉民投靠满洲贵族或八旗官兵为奴仆。据清代文献记载：“国初，投充名色起于墨勒根王，许各族收投充贫民为役使。嗣则有地土者，带地投充。奸盗无赖，或恐圈地，而以地投；或本无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养吉斋余录》卷一）其中，带地投充，实为“圈地”的一种特殊形式。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1645年4月21日），清廷给户部的谕旨规定：贫民“如因不能资生，欲投入满洲家为奴者，本主禀明该部，果系不能资生，即准投充；其各谋生理，力能自给者不准”。此谕旨使“投充”合法化。伴着“圈地”之风席卷而来，“投充愈演愈烈”。



## 琉璃河的铁路职工教育基地

侯敬德\*

1949年至1966年间，职工教育以文化补习与扫盲为主，基本上没有专门用于职工教育工作的教室及设备。教员一般利用晚间或业余时间下到工区班组，在工区或宿舍讲课，授课工具只有小黑板等简单用具。举办脱产、半脱产技术培训时，教学地点选在生产厂房、办公室或停留在车上，修旧利废自制一些简单教具辅助教学。

1971年，分局举办车务培训班，在宝产招待所临时借用几间平房做教室，以后这里曾多次举办过各种技术业务培训班，成为北京铁路分局职工学校的前身。

1975年，北京铁路分局职工学校正式成立，校址设在琉璃河。接管原中心站房屋，添置了课桌椅等教学设施，共有教室3间，能容纳学员150人。基层站段陆续筹办教学基地，职工教育基地和教学设备发展较快。

---

\* 侯敬德：门头沟区政协文史特邀撰稿员，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员



1984年,全局教学基地校舍或教学总面积达到2.3万平方米。用于购买教学设备的资金15.63万元,占当年教育经费实际总支出的30%以上。1985年,基层站段办学条件改善,研制出光电示教板、6502大站电气集中模拟设备、ND5型机车单显板、东风4型油水管路光带显示板等辅助教学设备。1986年后,用于职工教育的经费逐年增加,对全局职工教育教学设备进行了补充和更新。1990年,路局、分局、站段在专用教学基地项目内一次性投资20多万元,增建技能演练基地和购买、制作各种电化教学设备,人均教育基地面积达到0.32平方米,基本达到部局规定的人均0.3—0.5平方米的要求。1991年,分局职工教育经费总支出208.6万元,用于教材教具费用开支59.7万元,其中购买微机35台,比1990年增长4倍。1992年,分局增加对职工教育的倾斜性投入,从基建、设备到人员配备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全年共投资50多万元,为17个单位配置摄像机、录像机、彩电等电教设备。经北京市劳动局验收,上述6个基地获得“北京市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场证书”。1993年,分局人均教育基地面积达到0.6平方米。

1973年,教育基地开始组织编写较正规的教材,当时丰台机务段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转型过渡,为保证安全运输生产,做好机车乘务员转型培训,编写教材47种,印制10万册,培训职工2500人。丰台车务段先后编写30个项目9万余字的教材,印制2000册。北京站编印10个工种的《应知应会》。丰台机械保温车辆段编印411万字教材与学习材料,1979年完



成《铁路冷藏运输》一书编写出版工作。1981年,为配合职工“双补”教育,分局和基层单位编写语文、数学两课复习辅导资料,印制 9.9 万册。1984 年,教材建设向电化声像发展,分局拍摄成各工种防寒过冬教育幻灯片和 8 个主要工种标准化作业幻灯片。1985 年,分局筹办录音、放像中心,运用录像设备推广标准化作业。1986 年,分局决定每年专项拨款,为职工教育购买教学设备和器材,当年重点解决摄像、录像配套器材。分局继续组织拍摄安全教育录像带 8 种,制成 19 种防寒过冬教育幻灯片。1987 年,摄制《中间站长培训》等 6 部录像教材及 9 部幻灯片,编印《工务系统中级技术理论培训》等 12 部教材。1988 年,分局成立职工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提出加强教材建设,教育部门与教室合作编写生产急需的培训系列教材。年内组织编写 70 余种、350 余万字的职工培训教材。摄制《运转车长应急培训》等 17 部录像片。1989 年完成 15 种教材的编写,总计 269 万字,出书 2.55 万册,制作幻灯片 9 部。1990 年编写文字教材 20 种 415 万字,年内出版 15 种,摄制《血的启迪》《零担集装箱货物运输》两部录像片。1991 年,教材编审工作吸收“MES”培训模块教学思想,增强教材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加强教材管理,提高编审质量。西直门电务段推行“MES”模块教学法,主编《64D 半自动闭塞模块》,并建立与模块教材配套的学习站——64D 继电设备模块学习室。1992 年,教材编写以新的技术等级标准为依据,提倡小型、多样、实用、适时对路的学习教材,并立足与培训、考工、自学等配套。年内编写



出版教材 24 部 320.8 万字,其中路局级教材 7 部,分局级教材 8 部,站段级教材 9 部。1993 年编写教材 9 部,《养路机械手册》等 4 部出版发行。1994 年编写教材 10 部,其中有一部录像片。1995 年编写教材 9 部。

1986年,分局举办第一期《工程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修班》,1047 人参加学习。1988 年第一期专修班结业,有 507 人取得合格证书。同年开办第二期专修班,有 750 人参加,结业合格 510 人。1989 年开办第三期专修班,有 49 人参加。1986 年至 1989 年接受知识更新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有 1846 人,占当时工程技术人员总数(2200 人)的 83%。

1989年实行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专业证书》制度,组织《专业证书》学员培训。1990 年取得大专《专业证书》班毕业 10 人,1991 年毕业 49 人。1990 年取得中专《专业证书》班毕业 25 人,1991 年毕业 49 人,1992 年毕业 7 人。各项《专业证书》作为评审、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管理职务和其他职务任职资格的依据之一。



## 一张难忘的照片

魏志华 \*

1993年12月，夏方伟、白璧、王鸿元、韩臣子我们一起入党的5个人，在入党41周年的时候，在一起聚了聚，共同回忆入党时的情景，畅谈几十年的战斗历程，大家都很兴奋。夏方伟同志还作了一首诗。座谈后，我们又一起到当年举行入党宣誓的旧址看了看，并在门前合影留念。

如今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就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老朋友的思念。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少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底，经过房山县直机关各单位党员大会讨论，机关党委批准，共发展了7名党员。有中苏友好协会的白璧，政府的王鸿元、夏方伟，县供销社的王文，医院的韩臣子，邮电局的刘恒和团县委的我（魏志华）。过去党员入党，都是在各单位举行入党仪式，而这次是房山解放后第一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发展的党员，在县委机关举行

---

\* 魏志华：房山区人大农委原主任



仪式，比较隆重。这一年的 12 月 25 日，县直机关党委在当时的县委礼堂（后划归房山县招待所、房山宾馆）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还有一部分群众代表参加，共 300 多人。会议开始后，先由机关党委的同志宣布发展新党员决定。我们几个人站到了台前，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由机关党委的同志领着我们一句一句地宣读入党誓词。之后，王鸿元代表新党员发言，卫生科长王力代表群众发言，最后机关党委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讲话。他们讲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对新党员和老党员分别提出了要求。这一天我特别兴奋，晚上写了日记，作出了工作计划，从此，自己努力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更加严格要求。

1953 年 2 月中旬，刚过了春节，为了配合全县开展的《婚姻法》宣传月，县委从各机关抽调 10 来个人，组成宣传队到六区（现在的霞云岭、蒲洼两个乡的范围）宣传《婚姻法》，我也被抽到了这个宣传队。当时山区没有公路，只能步行，我们都背着棉被、棉褥。去时从河北沟走的，走了两天才到霞云岭。六区区委又把我们分到西片。我们在区里住了一夜又继续西行。从堂上、宝水、东村、蒲洼，一个村一个村地一直走到了离县城最远的芦子水、鱼斗泉。每到一个村，先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了解贯彻《婚姻法》的情况，然后再召开群众大会，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宣传。两片儿工作结束后，一部分同志回县，区里又把我分到龙门台村。这个村人居很分散，为了使宣传工作更加深入，也为了方便群众，我克服困难到各片区开会、宣



传。这个村的金章梁离村三四里，在一个山头上，虽然只有几户，我也专门去一次，把几户的群众叫到一起，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宣传《婚姻法》。群众特别实在，对我也特别热情。中午没等派饭，就把我拉到家里吃饭。在霞云岭下乡的时候，正赶上下了大雪，我便和群众一起从村里往地里背雪，抗旱保墒。三月下旬，接到县里通知，叫我们回县。回来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没有从河北返回，而是走的山路。回县那天，天刚亮我们就从霞云岭动身，到三流水村吃的早饭。过了三流水，路越来越难走。一是山越来越高，二是当时阴坡的雪还没有化，看不清路，我们只好用拐杖一边探路一边走。直到中午我们才走到海拔 1000 多米的清风岭。过了清风岭，山下就是黄山店的涞沥水村。虽然只有十几里路，但是直上直下非常陡，也很危险。直到下午 2 点多钟我们才下了山。感到肚子饿了，但路上没有饭店，又没有时间派饭，我们只能到黄山店村的小铺里买点花生来充饥，随后继续赶路，直到天黑才到县城。我们整整走了一天，脚也起了泡。

4 月初，我又参加了县委组织的春耕生产工作组，曾到三区的长沟、坟庄，五区的石窝、南尚乐等村检查春耕生产，宣传农业技术。

4 月下旬，河北省委在房山县搞撤区建乡的试点（其他县是 1954 年以后才搞的），就是把原有的区撤销，县下边设乡为基层政权组织，每个乡包括两三个村。房山的撤区设乡分三批进行，平原两批，山区一批。第一批划乡从四月下旬开始。



工作组经过短期培训后，五月初到村，我参加了两期。第一批在四区的五侯乡（包括五侯、尤家坟两个村）是县委的重点，县委、县政府、团委、妇联各部门都派人参加。经过宣传动员、发动群众、选拔干部，到 5 月底结束。把乡党总支、乡政府及各部门都建立起来，设立了各项制度，每个乡配备 3 名半脱产干部（书记、乡长、秘书），各村设立了村委会、党团支部、民兵、治保等各部门组织。第一期划乡结束后，全体划乡工作组到五区的南尚乐村集中总结，并部署第二批划乡工作。总结工作后我没有回县，又直接进入第二批。第二批划乡，我分到三区的双磨乡（包括南正、北正、双磨三个村），6 月初进村，7 月初结束后我才回县。上半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下乡，没在机关工作几天，生活确实比较艰苦，工作也比较累，但自己没有丝毫怨言。认为自己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到不同地区，做不同的工作，对自己是个很好的锻炼，这也是入党后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这次下乡回来后我便调到了县委办公室。

入党后，自己不仅工作上积极努力，埋头苦干，在生活上要求也很严格。平常没有假日，结婚时不仅没办婚礼、没有休息，结婚那天照常上班，甚至连早晨学习也没有耽误（当时机关干部每天在早饭前，集中学习一个小时）。另外，当时行政机关实行供给制，企事业单位实行工资制。同样的干部，供给制比工资制的待遇要低一半左右（供给制的干部每月 130 斤小米，平均 14 元左右）。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夫妻双方，一方是工资制的，另一方可以改为工资制。我结婚后，爱人当时是



教师，是工资制，我仍坚持供给制。不止我这样，白璧、王守刚等同志都是这样，谁也没有改。直到 1956 年全国取消供给制，我才最后一批改为工资制。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共产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只能考虑革命工作，不能计较个人待遇。

几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特殊事迹，但始终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按时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各项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在任何情况下，对党的信念没发生过动摇。1990 年前后，我们几名一同入党的同志都先后离休、退休，现在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夏方伟、白璧同志都先后离开了人世。自己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并尽力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永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 从“燕谷长虹”谈房良地区的 施茶文化

孟令卫\*

轮蹄南北阻惊涛，圣主当年建石桥。  
一带长堤横绿野，四时佳景漾青霄。  
楼台倒影波中印，杨柳因风镜里摇。  
翘首更疑云路近，行人络绎度虹腰。

这是前明翰林郭秉聪为琉璃河大石桥题作的七言律诗，诗名《燕谷长桥》。

琉璃河石桥位于房山区南端的琉璃河镇，是北京四大古桥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卢沟桥，有着“畿南第一桥”的美誉。

大石河古称圣水，琉璃河就是圣水河在琉璃河镇境内这段河流的称呼，因河水澄澈底，朗若琉璃而得名。

金大定年间，琉璃河上已建有木桥。每逢夏秋，大房山各条沟谷的山洪及溪流汇集于此，势如脱缰的野马，汹涌奔腾。

---

\* 孟令卫：房山区纪委区监委四级调研员



琉璃河水巨河宽，常常将木桥冲断，南北客商及行人被河水阻滞，甚至造成四方进京的驿奏被延误的情况。

琉璃河大石桥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桥长 165.5 米，宽 10.3 米，高 8 米，桥体用巨大石块砌筑，桥面两侧条石用“铁锭”连接。桥面两侧有望柱 88 对、实心栏板 178 块，桥孔拱券顶部雕有精美镇水兽头，桥北段西侧还有一根 10 余米长用铸铁锻造的镇桥梁以镇“河妖”。

为便于通商，石桥东侧建有漕运码头，行船可通天津、保定。琉璃河一水空明，帆樯云集，开窗西望，万柳萦堤，西山似黛，蜿蜒起伏的石桥宛如雨后一道彩虹横跨河岸两旁。因河北岸有皇帝离宫人称“燕谷店”，故这美如画卷般的景观被称为“燕谷长虹”。

现在，以琉璃河石桥为中心已建成休闲健身公园，桥北端东侧收集了十余块古碑，其中 3 块与石桥有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春立的《新建琉璃河桥记》碑，碑高 3.71 米、宽 1.12 米。碑文详细记述了敕修琉璃河石桥的起因、经过及花费情况。

第二块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立的《敕修琉璃河桥碑》，碑高 3.2 米、宽 1.18 米。碑文记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冬，明神宗令工部主事胡瓚对被洪水冲毁的三处桥洞和路堤进行修缮的经过。

第三块是立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八月的《敕修琉璃河桥海潮观音庵碑记》残碑。该碑原在石桥北头西边，碑文是对《敕修琉璃河桥碑》末尾提到的“于桥之北，创为神祠”



的补充。

明初有着黑衣宰相之称的姚广孝助成祖朱棣完成“靖难之役”后，爵至少师，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可他并未贪图功名，不久即“辞归山林，隐于太湖之华严寺”。周口店镇大韩继村的古刹香光寺，俗称“少师园”，也是朝廷赐给他的别业，同为其隐居之所。万历二十六年（1598）曾对香光寺进行重修。

寺内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立的《福德庄严碑》，碑文同样印证了《敕修琉璃河桥海潮观音庵碑记》的内容：“恭仁康定景皇帝（明代宗朱祁钰）陵管事兼御前办膳钦赐蟒衣玉带增加禄米内府骑马御马监太监张其，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岁奉命，赍出内帑钱粮，并内外官僚俸金，同共发心，重新敕赐护国香光寺……琉璃河桥北头施茶海潮观音庵一所，并地二百七十亩，亦是本寺下院。”

寺内还有《重修香光寺缘起碑》一座，碑文也有关于琉璃河石桥施茶观音庵的记载：“三十一年（1603）春，内官监太监何江，奉圣旨修琉璃河石桥成，并修施茶观音庵一所于桥侧，治买随庵香火地二百七十亩，以供本庵施茶香火之需。何监题准，礼部给割与香光寺住持真奉兼领琉璃河桥头观音庵施茶。”

明朝时期大韩继隶属房山县，琉璃河镇隶属良乡县，这两个相距数十华里的地方，因“古刹香光寺”和“海潮观音庵”而联系在了一起，海潮观音庵是香光寺的下院，由香光寺住持真奉大师兼领。这就引出了中国古代非常盛行的一条善良民



俗——施茶。

据考，施茶善举起自五代时期浙江新昌县的“大佛茶”传说。一位酷似弥勒佛、法名为“契此”的和尚用茶水救治了中暑昏厥的农民。这位农民为报契此和尚的救命之恩，就在大佛寺门前摆了一个茶亭，免费为行人提供茶水。这一善举被逐渐推广，一些善心人士在山岭、路边、桥头、城门外以及风景名胜摆下茶摊，用木棍、茅草搭建简易的茶棚，讲究的还建了茶亭，为过往行人和行脚僧施茶。后来僧人逐渐成为这一善举的倡导者和管理者，建了茶庵，劝民众赞助施茶。在施茶的同时，施茶庵也就具有了传播宗教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浙江、福建等地普遍建有施茶亭。良乡县境内还有一处名为“三教寺”的遗址也曾为僧人的施茶场所。三教寺位于良乡城东北的塔湾村（现属梅花庄村），又名寿因寺、十坊院，信奉释道儒三教的人士皆可来此修行。

三教寺建于明万历中期，由江夏僧人体空创建。体空一路流浪至此，衣不遮体、风餐露宿，“酸苦之际，此愿勃发。自是乞得一笠地，编茶棚半间，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间，赖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蓝。北参南询之侣，至者如归；官邮之使，络绎于门。汤茶之供无宁晷。”饥寒交迫的僧人体空由己及人，通过化缘建成茶棚半间，后赖众檀越的资助扩建称寺庙，不但为“北参南询之侣”提供汤茶，还能提供舒适的食宿服务。

其实，与良乡县紧邻的房山县的石经山上也有一处施茶场所。



在石经山的半山腰处，有三合院结构的小庵一座，原系唐代僧人为接待朝山人员而建，初名“半山庵”，后更名“接待庵”。

1985年，在颓废的接待庵遗址上进行了复建，庙门门额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庵名“施茶亭”。院内正殿三间供奉接引佛，左右配殿各三间，右配殿门楣题“圣水茶屋”四字。院内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立的“石经寺施茶碑”和天启三年（1623）腊八佛成道日立的“小西天施茶亭新建碑”为我们揭开了这里的谜底。

隋炀帝受感于静琬大师雕刻石径的壮举，于大业十二年赐给静琬肉身佛舍利三颗。静琬将舍利用青石函保存并埋在了雷音洞弥勒佛像背后的石板底下。明万历二十年，达观可禅师在清理雷音洞时，无意间发现了石板下藏有舍利的石函。石函内的舍利状如黍米，色泽红紫，此事轰动朝野。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下旨将三颗舍利迎入皇宫供养三日。可在宝函归还后，达观可禅师发现石函内的舍利被2个羊脂玉函封藏，而数量却少了一颗，代之的是两颗珍珠。由于明末时局动荡，达观可禅师未敢声张，用了五层石函将二颗佛舍利再次埋藏。缺少的那颗舍利究竟是被太后私藏还是在归途中遗失，已成历史疑案。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的出土成为佛教史上轰动的大事，以至于全国各地来此观瞻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有位李姓善人不忍路人朝拜的辛苦，遂发善心，在接待庵佛殿两旁建了施茶房，以供路人休息，于是此庵又名“施茶亭”。

施茶，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善举，在当时却意义非常。



正如明朝大文豪袁宏道所言：“烦热隆寒，九十者半，渴骥奔泉，行人在道。当其炎则焰在喉，与其寒则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间，而所活者至不可计。”

施茶活动所施之茶，茶叶自然是主要原料，但茶的成分也会依季节而有所不同。炎炎盛夏，要在茶叶中加入青蒿梗、砂仁、豆蔻、薄荷等为行人解暑降温；冬季要加入大量生姜为客人驱寒。除去茶资外，烧水柴薪的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见茶庵的设立与维持并非易事。

施茶经费的筹集途径主要有：

其一，个人捐款。乐善好施的乡绅、百姓自愿给茶庵捐款，有的官吏也捐献自己的薪俸。

其二，团体捐款。为了使得施茶的善举能够长久进行，在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叫“茶会”的组织。这种组织有的以田产作为固定资产，用租佃收入作为茶的经费；有的利用庙会活动，由牵头人收集钱粮作为经费。

其三，邑诸宰官向茶庵拨付经费。

其四，茶庵以受捐的土地或朝廷拨付土地的收益作施茶费用。

良乡古为燕国中都属地，以民风朴素淳良而得名，明朝时为京畿近邑，“路控东西南三方，东南十三省往来有事京师者皆取道于此，内外大小臣工之宣纳，诏令者、秉承职事者、朝者、贺者，往返必信宿焉”。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商旅贸易发达。良乡城作为县城所在地，其繁华毋庸赘述，仅



三教寺所在的塔湾村就有商铺四十余家，辘轳之声从凌晨鸡鸣至晚上三更时分不绝于耳。琉璃河街作为朝宗孔道，设有帝王离宫、邮亭，有关帝庙、龙王庙、真武庙、石佛寺、娘娘庙等众多祭祀场所，街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马骤车驰，征途络绎。这里既是石灰、煤炭等生活用品的集散地，还是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琉璃河两岸茂林环绕，杨柳婀娜，成群的鸳鸯嬉戏于水，晴天虹影倒影在荡漾着碧波的水中；时至傍晚，丹碧空行，光影洞澈；水声触梁，逶迤而东，大或飘霆，小或箏筑。至若春暖秋明，商旅、差役解装释馱，游人踏杀而过，在桥头施茶庵中小憩，在观赏身边美景的同时，一杯醇美的清茶过喉，眼若开而心若释，一路的饥渴烦闷顿时消散。

民国版《良乡县志》在《古迹·祠庙》一节对琉璃河石桥海潮观音庵没有提及。据 1959 年 1 月北京市第 1 次文物普查资料，海潮观音庵碑位于石桥北头路西。经采访当地耄老，据祖辈描述茶庵原有寺庙五间，庙北有古井一口，井水清冽甘甜；新中国成立前施茶庵就已坍塌，遗址只留有高一米左右、面积数十平方米的石基。

据现有资料不能判断施茶庵在日伪统治时期是否坍塌，但即使存在也不会有施茶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在琉璃河街里出现了几个茶棚，免费向行人提供开水，茶壶里几分钱的茶叶可无限续水冲泡。这应算是施茶风俗的继承吧！可惜在那场政治运动到来后，这一善行也销声匿迹了。



为了加强对琉璃河石桥的保护，2002年在桥西侧架设了一座现代化的桥梁供机动车通行。

一杯清茶，洗涤乡风、滋养民风。茶余饭后的游人在有着数百年魂魄的“燕谷长虹”上闲庭漫步，既能欣赏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还可品味蕴含深厚的施茶文化。